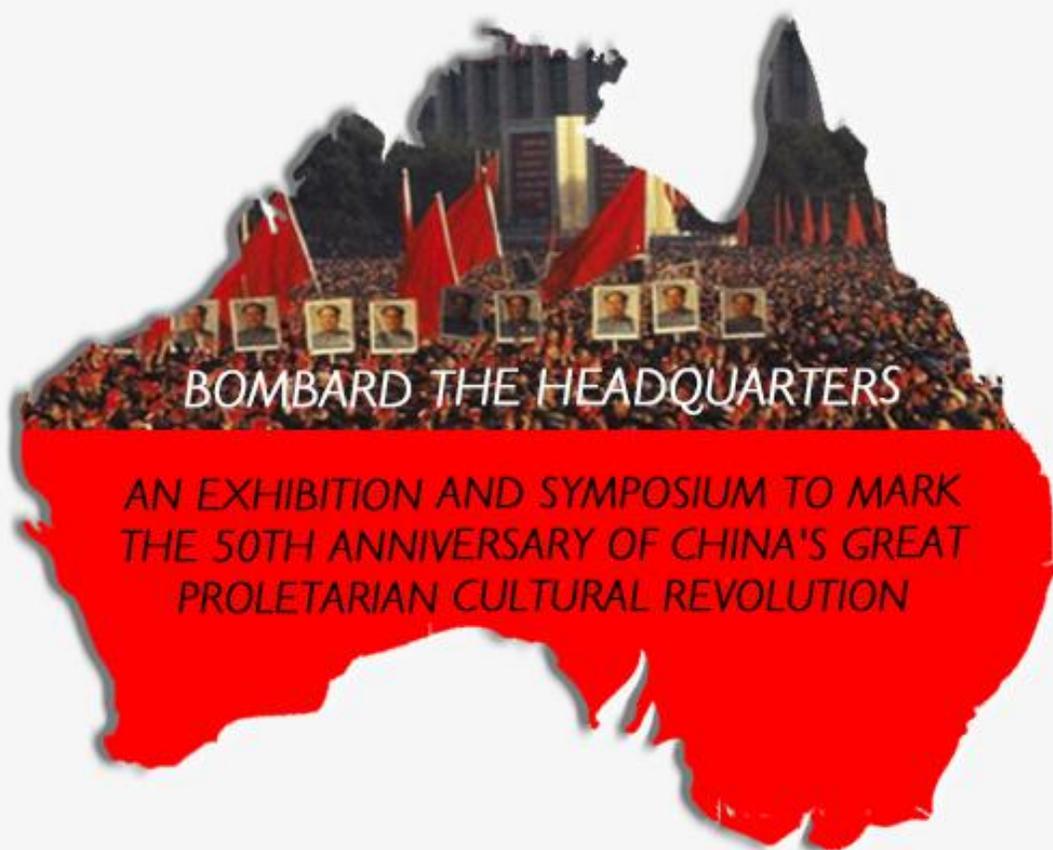


記憶

REMEMBRANCE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7年11月15日第26期 总第204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记忆》204期

澳洲文革研究专辑

目录

【专稿】

王 侍 “炮打司令部”

——墨尔本大学文革暴发50周年纪学术研讨展览会

附：安东篱（Antonia Finnane）学术简历

王 侍（Shan Windscrip）学术简历

【序跋】

何与怀 毛泽东与当今中国社会——《文革五十年祭》代序

【读书】

何丹尼 满纸荒唐言 一把辛酸泪

——读项德宝《“文革”牢狱之拍案惊奇录》

【述往】

冰 夫 久缠心头的“5·16”梦魇

——确实与金敬迈无关

胡仄佳 生命中的血红碎片

刘 放 文革杀人现场目击记

安 红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院内院外

【本刊声明】

【专稿】

“炮打司令部”

墨尔本大学文革暴发 50 周年纪学术研讨展览会

王侍 (Shan Windscrip)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发表了一张他所谓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事实上，那不过是他用铅笔在报纸的边缘处写下的“小字报”。正是这张小字报，将中国投入到大浩劫之中。

然而，大浩劫却是由一件一件的小事情堆积起来的。魔鬼就在细节之中，小人物、小事件、小场景——在近年来获得一部分文革学者们的关注。与以往的偏向宏观性的文革历史研究角度不同，微观的、底层的、日常生活中的事物，正在发展成为文革研究领域中具有特殊历史、社会、文化意义的研究焦点。尽管像金茨堡的《奶酪与蛆虫》那样的微观文



化史学著作在文革研究学界尚未出现，一些敏感的学者已经注意到“小”中所蕴藏的巨大意义。金大陆的《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孙沛东的《时尚与政治：广东民众日常着装时尚(1966-1976)》，Jeremy Brown 与 Mathew D. Johnson 共同编辑的 Maoism at

Grassroots: Everyday Life in China's Era of High Socialism (《基层毛主义：中国高度社会主义时代的日常生活》——本文作者译)，以及 Barbara Mittler 的 A

Continuous Revolution: Making Sense of Cultural Revolution Culture (《一场持续的革命：理解文革文化》——本文作者译)，都是从“小”的视角入手，展示出更具生活性、人文性和多元性的文革历史面貌。

2016年8月4日至6日，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以“小”为基点，围绕着一一些过去常被忽视的话题，召开了一场纪念文革暴发50周年的跨学科学术研讨展览会。活动由墨大历史哲学系汉学家安东篱（Antonia Finnane）教授和她专门从事文革研究的博士研究生王侍（Shan Windscrip）女士，以及墨大建筑规划系的朱剑飞副教授联手举办。与学术会议同时进行的还有一个小型藏品展览（策展人：王侍）特别展出大学东亚图书馆收藏的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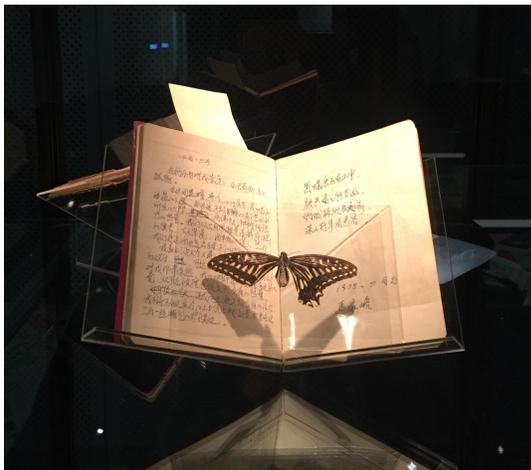


系列珍贵的文革馆藏，包括日记手稿、教科书、海报、漫画、地图、明信片、宣传册、音乐乐谱等等。

本次会议邀请来三位嘉宾做主旨发言。德国海德堡大学汉学研究中心的梅嘉乐（Barbara Mittler）教授围绕着文革是什么？为何被人们铭记的话题，展开题为“活在文革中”的开幕式演讲。江苏省南京市东南大学建筑学院的李百浩教授就“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城市规划”的话题，讲述了文革期间实施的三线建设背后蕴藏的历史文化意义。一位大陆学者兼资深文革资料收藏家（匿名），同与会学者和听众分享了他多年的收藏经历，并介绍了他的私人藏品。

此外，会议六个专题小组中还包括来自澳大利亚、中国、英国和新加坡的多名年轻学者。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发言包括：复旦大学历史系孙沛东副教授的“知青地下阅读”；墨

墨尔本大学历史哲学系王侍女士的“路交叉口上的革命：知青日记中的城乡书写”；墨尔本大学建筑系吴名博士的“毛泽东时代的上海人民广场：意识框架和激进社会实践的空间”；上海大学于奇赫先生的“文革期间对文物的破坏与保护”。



更特别的是，会方主办人认为，文革已经超越了它原有的文化特殊性：在过去的25年中，伴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移民海外，许多文革亲历者都将他们的个人历史记忆带出国门；因此，文革也应被澳大利亚人作为跨文化遗产所纪念。会方为此特别邀请了曾经亲身经历过文革的澳籍华人和他们的后代，在大会的结尾组成闭幕发言小

组，由王侍做中英翻译，与听众分享他们丰富多彩的个人历史和记忆。这意味着身处澳大利亚的学生们，不论华裔或非华裔，都能亲身接触到这份文化遗产。

为期三天的“炮打司令部”学术研讨展览会，在细节中展开，在小人物中结束，为世界各地的学者和听众们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交流平台，让人们对“文革”的了解不再局限于暴力和政治斗争。借用金大陆教授的说法，墨尔本大学“炮打司令部”会议展览为人们展现的是十年“非常”政治运动时期中的即“非常”又“正常”的生活文化。■

附：

安东篱学术简历：

Antonia Finnane 教授的研究重心是中华帝国晚期与近现代时期中国的社会史和物质文化史。她的著作包括 *Speaking of Yangzhou: A Chinese City, 1550-1850* (中译本：《说扬州：1550—1850 的一座中国城市》)，以及 *Changing Clothes in China: Fashion, History, Nation* (中译本：《中国的服饰变迁：时尚、历史、国家》)。她曾任《亚洲研究学刊》与《亚洲研究评论》副主编。此外，在2012年，她还曾任职《内幕》杂志驻北

京通讯员。目前，由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资助，她正在研究早期共产主义时代下的北京小型商企和手工制造业。

王侍简历：

Shan Windscrip 是墨尔本大学历史哲学系的博士研究生、本科生教师、研究助理，师从安东篱（Antonia Finnane）教授。她的博士论文研究文革时期的日记书写，是一项对毛泽东时代文化史、政治史具有开创性意义的研究项目，将在2017年底完成。

2015年，王侍被墨尔本大学赋予“诺曼·麦乔治学者”（Norman Macgeorge Scholar）称号和研究奖学金，在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历史系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访问。

2017年，她荣获美国“周锡瑞叶娃基金会”（Esherick-Ye Family Foundation）和美国亚洲学会“中国与中亚研究委员会”（AAS China and Inner Asia Council）颁发的两项研究资助。她的研究重心是近代中国文化史和政治史，特别对底层文学/书写（literature from below）感兴趣。

墨大历史系研究文革及招收博士的概况：

墨尔本大学面向世界各地招收博士研究生。除了历史哲学系以外，政治社科系、亚洲中心也有资深的近代史研究师资团队。

详见：

https://futurestudents.unimelb.edu.au/__data/assets/pdf_file/0007/2094712/2017-Graduate_Research.pdf

【序 跋】



作者简介：一九四一年出生，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博士。现为澳大利亚悉尼华文作家协会荣誉会长、澳大利亚南澳出版基金评审、澳大利亚中华文化促进会副会长、《澳大利亚华人年鉴》编委、澳大利亚华人文化团体联合会召集人。著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文化用语大典》、《紧缩与放松的循环：1976至1989年间中国大陆文学政治事件研究》、《精神难民的挣扎与进取》、《北望长天》等多种。

毛泽东与当今中国社会

《文革五十年祭》代序

何与怀

一，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广大民众、中共思想理论界以及中共高级领导干部，经历十年“法西斯专制暴政”后，痛定思痛，热切参与“拨乱反正”，体制外和体制内都出现了一股“评毛批毛”浪潮。

1976年10月6日，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一伙被抓。消息传出后，全中国民众无不拍手称快，为这场反文明、反人类、摧残中华民族的大劫难的结束喜极而泣。当时人们把文革定性为极其残酷的“十年法西斯专制暴政”，全国掀起一个铺天盖地的控诉、批判浪潮。在文学领域，出现“伤痕文学”，后来进而有“反思文学”。各式各样的非官方刊物也像雨后春笋，纷纷问世。从1978年冬到1981年春，仅北京就有五十余种出版，较著名的如《探索》《四五论坛》《中国人权同盟》《今天》《北京之春》……等等。北

京在1978年至1979年间还出现令人瞩目的西单民主墙，每天群情汹涌，张贴许多不同政见的大字报。许多文章，包括文学艺术作品，以激烈悲愤之情，揭露、控诉江青、林彪两个所谓“反革命集团”及其爪牙的罪行，这也是当局所需要的，可以堂而皇之进行，加之他们的种种罪行确实罄竹难书；而其中所透露的精神实质，是要肃清专制余毒，要言论自由，要争取人民权利，是呼唤第五个现代化——民主化，是评论、批判毛泽东（“评毛批毛”），找出罪恶的根源……这个“非毛化”浪潮，一时声势浩大，波及全国，俨然中国民主运动的开端，被史家称之为“北京之春”。中共当时要“拨乱反正”，所以领导人也给其以很高的评价。叶剑英在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内民主的典范，西单民主墙是人民民主的典范。”胡耀邦认为，西单民主墙是“人民新的觉醒”。有一段时间，邓小平对西单民主墙也是肯定的。1978年11月，他借接见日本客人的机会表示：“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力否定或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让他们出气。群众的议论并非一切都是深思熟虑过的，也不可能要求完全正确，这并不可怕。”在当月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总结讲话中，邓小平更掷地有声地说：“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不同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

如果说，历经十年暴政的体制外广大民众通过地下刊物和民主墙自发评毛批毛，为民主、自由、人权大声疾呼，并不足为奇，那么，1979年1月18日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召开的全国理论务虚会，则可谓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理论界一件破天荒大事。在第一阶段会上，体制内的思想理论界，首次公开出现大规模评毛批毛的壮举。近两百位与会者解放思想，争相发言，痛快淋漓，会议气氛非常活跃。

与会代表以“实践标准”的精神广泛地论及到1949年以来中共思想理论路线方针各个方面，指名道姓公开批评毛泽东，批判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批判他极左的思想、理论、指示和决策，诸如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全面专政理论、关于走资派-党内资产阶级的理论，等等。所有这些文革中被认为是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贡献、体现了“第三个里程碑”的宝贝，全都受到批判。与会代

表对中共建国以后历次政治运动提出质疑，认为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四清、文化大革命，统统是毛泽东左倾路线的产物，造成的冤假错案，都应该彻底平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被批得很凶。为“十七年”正名的结果，也得出“毛主席革命路线”就是极左路线的结论。与会代表批判“两个凡是”，全面否定中共十一大仍表示要坚持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会上很多人还主张：把西单民主墙变成一个常设的发扬民主的阵地，要给它建一个挡风避雨的场所，大家可以到那儿去自由发表意见。

在会上，王若水一马当先，开公开评毛之先河，作了振聋发聩的长篇发言，题目为《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教训是必须反对个人迷信》，整整讲了一天，反应异常热烈，被誉为评毛“第一炮”。哲学家王若水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得以参与高层意识形态工作的讨论，因而对毛泽东的为人和毛泽东思想有深刻的研究和认识。在王若水看来，毛泽东总是犯左的错误，越左越反右，越反右就越左，恶性循环，越搞越乱，终于无法收拾。左在经济上的表现是“大跃进”，这和毛的好大喜功有关；左在政治上的表现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又和毛的缺乏容人肚量和猜忌多疑有关。这里是毛的个性起作用。毛泽东的这种个性之所以能不受抑制地发展，这就有制度的条件（高度集权体制），也有文化的原因（包括传统文化和来自苏联的党文化）。在这种体制下，加上意识形态方面的个人迷信，毛几乎可以为所欲为。王若水一针见血地指出：“个人迷信是文革能够产生的重要条件。”

当时担任中国历史博物馆党史研究室主任的李洪林也在会上做了一个长篇发言，题为《领袖和人民》。他认为，要求人民都用封建社会忠于皇帝的标准去对待国家领袖，绝不符合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要求每个党员都忠于党的领袖，也显然根本不符合共产主义政党的纲领和组织原则。他说，从历史观来看，《国际歌》和《东方红》就是不一致的。一个说“从来没有救世主”，一个说“他是人民大救星”。还有一首歌，叫做《大海航行靠舵手》，它把鱼水关系完全弄颠倒了。如果党是“水”，人民是“鱼”，那么1921年以前，几万万人民岂不是都变成干鱼了吗？他的结论是：“不是人民应当忠于领袖，而是领袖必须忠于人民。”

公开评毛批毛的思潮甚至发展到中共领导干部大会上。1980年秋，中共党内四千高级干部（中央机关约一千人，地方、省军级干部三千人）加上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的一千五百多名学员，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进行了一次大讨论。史家认为，如果说理论务虚会是理论界的思想解放，那么，这次讨论会就可以说是党内高层干部的一次思想解放。

当时会议简报刊登许多精彩的发言。例如：中共元老、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在发言中列举了毛泽东的片面性和十大错误：不熟悉科学社会主义；不熟悉产业工人和资本家；不熟悉工业；不懂政治经济学；不研究经济规律；对知识分子按世界观划阶级，主张“外行领导内行”，批“臭老九”；搞农民平均主义，1958年搞“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发作；在需要“外为中用”时，大批国际修正主义，把“自力更生”变成“闭关自守”；1964年提出四个现代化，1966年又开始搞四个大破坏；钻进线装书，搞他的“古为今用”。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李颀伯说，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不是为了反修防修，而是以整人开始，以整人告终。团中央书记胡克实说，毛泽东后来的思想走上唯意志论，认为个人意志可以创造一切，可改变客观经济规律，改变党和国家的根本大法，甚至改变历史发展的趋势，走上追求绝对权势和个人意志的王国、唯我主义的道路，实际上是犯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胡克实举例说毛出尔反尔的事情很多。他说，毛的问题“只有触及本质问题，才能解释。不能用（草稿中的）骄傲情绪、主观上要反修防修来概括，否则群众不满意，我们这些正统派也不诚服。”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张香山说：毛泽东的错误太大、太多。因此，很难把毛的错误思想排除在毛泽东思想之外。对外友协副会长、著名作家夏衍概括毛泽东的错误是十六个字：“拒谏爱谄，多疑善变，言而无信，绵里藏针。”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锐则言简意赅地概括毛泽东的性格特征是翻云覆雨、任性生变的“权变”谋略。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张爱萍上将说，毛是“言必称秦始皇”。著名经济学家、国家统计局副局长孙冶方说，毛“熟读的不是马列著作，而是二十四史。线装书看得太多，把封建社会帝王将相的权谋用到党内斗争上来了”。中纪委驻农机部纪检组第一副组长宋

敏之说，毛是“封建主义打底，马列主义罩面”。国务院副总理方毅说得更直白，他认为毛泽东是历史上最大的暴君，连朱元璋也不如他。

许多参与讨论者反对把毛泽东“同林彪、四人帮区别开来”。他们强调，1949年中共执政后存在一条“左”倾路线，毛泽东就是“左”倾路线的总代表，不能回避，毛的错误太大、太多，很难把毛的错误思想排除在毛泽东思想之外。最后，许多参会人员要求重新撰写《决议》这个文件。在重新写的过程中，应该解放思想，要摆脱一些人为的思想障碍。要明确毛泽东思想到底包不包括毛泽东的错误思想，或者把毛泽东的错误思想说成不属于毛泽东思想这个说法对不对。再则，《决议（草稿）》为把毛主席同林彪、四人帮区别开来，而说什么存在的路线一条是“极左”（林、四），一条只是“左倾”（毛），这种通过文字游戏来区别两者的论断显得太勉强了。还有，把明明是毛泽东个人的错误写成是全党的错误……等等。大家认为，草稿讲“我们党在大部分时间执行的路线基本是正确的”，这个估计显然与事实不符，以这种错误估计来写这段历史，不能不处处文过饰非，为毛的错误路线及其造成的灾难后果开脱。

这些中共领导干部，以其几十年的亲身经历，对毛泽东的思想、品性、行为及其在各个阶段引发的后果，深有体会，切肤之痛难以忘怀。他们所发表的言论，固然由于时代局限、自身局限，未必具有理论深度具有系统性，但句句实情，句句中的。

在那几年的拨乱反正、思想解放运动中，当时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书记处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胡耀邦功勋至伟。他以“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非凡胆略和高超的政治智慧，开始并完成了中共史上前所未有的浩大工程——平反冤假错案，给右派摘帽，基本解决了殃及一亿人的问题。他斩钉截铁地强调：所有冤假错案，即使是毛主席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胡耀邦在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还悄悄地取消了以“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为代表的贱民群体背了三十年的耻辱桎梏。他这个贡献堪比解放黑奴的美国林肯总统。在意识形态方面，胡耀邦顶着来自各方面甚至是最高层的政治压力，一步步推进那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的讨论。特别是，他毅然决然破除“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由此，那场此后被反复追忆、赞誉的思想解放大讨论全面铺开。原《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马立诚在其《交锋三十年》一书中评论道：如此重大的举动，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也属胆大包天！

二，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终止“非毛化”浪潮；
又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垮掉了的毛泽东重新树立起来。邓小平当时出于维护一党专政的考虑，认定一定要这样做，但也心知肚明，毛泽东难题终究要解决。

然而，文革以后所出现的这一评毛批毛、有可能让中国政治制度发生重大变革的势头，最后戛然而止。“力挽狂澜”者何人？第一人当推邓小平。

邓小平一度公开支持西单民主墙。但是，当西单墙延伸到大学（如北京大学三角地）；当西单墙运动与工人维权运动开始结合；当西单墙成为民主运动的代名词，并开始提升理论追求、要求中国实行政改、进入第五个现代化（政治文明现代化即宪政民主）；当西单墙运动开始成为国际新闻热点；当西单民主墙前聚集的人数从一天七千人增加到二万人；当多地省委被申冤的民众包围；当“西单墙”上体制外的欲求与“三中全会”后新中央班底的政治权威和治国思路产生冲撞；特别是在1978年末、1979年初的中央理论务虚会上，当王若水等体制内人士也开始从根子上否定传统意识形态、要求彻底的政治体制改革、并与社会上民主力量呼应时，邓小平忍耐不住了。他一百八十度翻脸，即与陈云联手给理论务虚会“纠偏”，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强硬收拾体制外力量，终结了这段短暂的“北京之春”自由时期。

这一连串事件经常为史家论及：1979年3月22日，《北京日报》发表《人权不是无产阶级的口号》一文。3月25日，魏京生在西单民主墙贴出那张被认为不合时宜的大字报

《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指名道姓批评邓小平“走的是独裁路线”。3月29日，魏京生被捕（到1980年在全国逮捕了民主墙与民刊活跃人士上千人）。3月30日，邓小平在由中共中央主持的最后一阶段的理论务虚会全体会议上，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

邓的“四项基本原则”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正如邓小平自己所说：“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共产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的确是这样。即使文革期间红卫兵和革命群众理直气壮地“踢开党委闹革命”，他们其实是遵照林彪副统帅的“四个念念不忘”：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四项基本原则”和“四个念念不忘”，说法不同，主旨一样，就是要坚持共产党历来的法统和道统，也就是和专制主义一脉相承的一党专政。

很有意思的是，这个理论工作务虚会分中间休会的前后两个阶段，而两个阶段的气氛和主导思想完全相反。据记载，1979年1月18日理论工作务虚会开幕，胡耀邦的引言报告话声刚落，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周扬就从邓小平家里匆匆赶来，传达邓小平的指示：“不要设禁区，不要下禁令。”邓小平唯恐大家思想不解放，不敢讲话，因而发出指导会议的十个字的方针。但这位当代“叶公”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党的几乎全部理论精英根本不需要什么鼓励，纷纷在会上争相评毛批毛要求政治变革。他被这个汹涌澎湃的浪潮打昏了，黯然叹道：“看理论务虚会的简报，越看越看不下去。”（见邓力群回忆录《十二个春秋》）他请胡乔木起草关于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要坚决刹车了。从3月28日开始的第二阶段会议也应声在4月3日草草结束。

1980年秋，中共党内四千高级干部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进行大讨论，会议出现的评毛批毛的“严重”结果，也是邓小平始料不及的。他当然绝对不会接受许多参会人员要求重新撰写《决议（草案）》这个文件的呼声，因为这个决议草案是在遵照他“宜粗不宜细”的方针下拟写的，是严格按照他的这个指导原则：“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1981年6

月27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通过了这个“决议”，为了保住毛泽东那面“旗帜”，也就顾不得什么“实事求是”了，更顾不得什么“群众满意不满意”了。

邓小平的“宜粗不宜细”方针，就是为了文过饰非掩盖历史。人们都说，写历史要有史德，中国的史学传统是秉笔直书。“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都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正气，是中国史学最可贵的传统。而对历史作个政治性的决议，要大家都来服从，这本身就是按照党派领袖主旨，出于某种政治需要，这就必然改写历史，粉饰历史，抹杀历史，或者凭空捏造历史。李洪林说，当初他参加1981年《决议》起草组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经过三十年的风风雨雨，才明白过来，不论第一个《历史决议》（1945年）还是第二个《历史决议》（1981年），都是为当时领导者的政治需要服务的。结果，邓小平这个《决议》，将文革定性为“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动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毛泽东虽然应为“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负主要责任，但他仍然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邓把已经垮掉了的毛泽东重新树立起来。

论者认为，邓小平否定文革，但不否定文革的罪魁祸首毛泽东，大致有三个原因。第一，文革中，虽然邓小平被称之为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后来甚至被定为“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但毛泽东始终严格地把他和要铲除掉的头号走资派刘少奇区别开来。邓小平在历史上总体来讲，是积极执行毛泽东路线的。毛邓两人对此均心照不宣。因此，邓维护毛，亦算是桃李相报；而且，否定毛，就一定会涉及到邓自己，邓当然犯不着干这种傻事。第二，邓小平他们不想因为否定文革而影响到中共的一党专制制度。所谓“文革要与文革时期分开”，就是说，文革可以否定，但是党不能否定，而毛泽东就是中共的祖宗牌位，所以他们不跟毛泽东算账，而是把责任推给江青、林彪等人承担，文革成了只是党内少数野心家、阴谋家做的坏事。第三，从本质上来讲，文革以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为核心思想，正是出自发展了马列主义的毛泽东思想，出自中共这个政党体内的基因。毛泽东思想是中共的指导思想，否定毛，丢掉毛泽东思想，就是没有了“体”，中

共的合法性便受到挑战。

这些年来，不少思想先进的中国人都有共识：文革始作俑者，非毛其谁？早已人人都说，“四人帮”实为“五人帮”，而且“五人帮”说法还是不准确——文革就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杰作”。林彪集团、“四人帮”集团、康生等人，乃至周恩来，无一不是毛泽东掌中利用或把玩之物。毛泽东独断朝纲，决定文革的起承转合，其决定性的个人作用无可伦比。把中共也就是毛泽东在取得政权后越来越左的方针政策路线一起宏观研究，文革就是“毛泽东极左路线不断恶化的必然结果”，完全是毛泽东思想的“外化”。毛泽东妄图通过搞文革，治疗他害怕被“睡在身边的中国赫鲁晓夫”鞭尸的妄想症，要将自己提升到生前死后都不可动摇的真命天子地位。

邓小平其实也不是不认识到毛的问题的严重性，不是不想到制度改革的必要性。例如，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他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邓小平接着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在实际上没有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¹

邓小平也心知肚明，知道毛泽东难题终究要解决。

据有关资料，1986年7月，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中顾委的联席会议上，邓小平说：“作为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对毛泽东作一生的政治评价是唯心的，是搞了中庸，是照顾当时的政治环境，顾及到部分同志的思想认识和情绪。我们是错的。这个错误主要由我来承担。但要说明，我们是清醒的。……再过十五年，要不二十年，对毛再作评价是必要的，时间成熟了。”他还说：“重新评价毛泽东，现在只能唯心、违心。在这个问题上，

¹ 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页333。

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党，我们还不够格！”¹

中国党史专家、前国防大学教官辛子陵大校在《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中还披露，邓小平于1993年1月15日在上海西郊宾馆召开的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也就这个话题表达他同样的意见：

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及功过的评价，是受到当时党内、社会上形势的局限的，部分历史是不实的。不少同志是违心地接受的。历史是我们走过来的，不能颠倒，不能改变。对毛泽东一生功过评价，一直是有争论的。我对彭（真）老、（谭）震林、（陆）定一说了：你们的意见是对的，但要放一放，多考虑下局面，可以放到下世纪初，让下一代做出全面评价嘛！毛泽东的功过是摆着的，搬不掉，改不了。有人担心对毛泽东全面评价，会导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被否定，会损害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我看，不必担心。我建议，对毛泽东一生的评价，可以在我们这一代走后，作全面评价。到那时，政治环境会更有利，执着意见会少些。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对过去的错误、过失和违心、不完整的决议做出纠正，是共产党自信、有力量的表现，要相信绝大多数党员，相信人民会理解、会支持的。

辛子陵在书中指出，江泽民、胡锦涛都清楚邓的意见。他在上述引语加了一个注：

1993年1月15日，在上海西郊宾馆召开了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中共第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全体常委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外，还有邓小平、陈云、彭真、万里、薄一波、杨尚昆、王瑞林。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关于若干年后对毛泽东历史地位和一生功过，要作出科学、全面评价的讲话。当时江泽民在会上提出，对小平同志这一谈话纪要及其它同志的发言纪要，作为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通过的议题存案。在会上曾举手表决，一致通过。

¹ 见《共识网》以及其他网上文章。

辛子陵在书中也披露，胡锦涛 2004 年 7 月回应中共元老万里时作了如下表态：

当年中央政治局和小平同志的意见、决议是存在的，我个人是理解的，迟和早要解决好的。这是建国后很主要的政治问题，党的组织问题。我们这一代人或许能在没有束缚的情况下处理好。当前工作千头万绪，待解决的问题、矛盾较多，如能在较平和的政治气氛、环境下解决对毛泽东的一生的评价，就能有较大的共识。¹

可是，到了今天，这个“共识”不但还没有找到，而且更加分歧了。

三，邓小平的“护毛”方针失去了评毛批毛的最佳时机。政治上的“距离美感”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空间的变换逐渐发酵，更主要的由于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极其重大的变化，解决毛泽东难题的“共识”已经丧失。缺乏政治体制改革的“改革开放”使中国成了世界上唯一且空前奇特的共产大国——既声称信奉谋求穷人解放的马列毛主义，又被权贵利益集团绑架了整个国家。

邓小平的“护毛”方针让历史失去了评毛批毛的最佳时机。从一般心理机制而言，所谓“魔鬼藏在细节里”，政治上的“距离美感”随着时间的推移空间的变换逐渐发酵，而这个“美感”却可能是完全大谬的错觉。今天，由于长期不准触及文革这个禁区，文革真相不让探讨，许多人对文革不单是淡忘而且更加认识不清了。文革经历者当年那种惨烈的切肤之痛，慢慢消失了；对始作俑者毛泽东的罪责追究，也变得似乎可有可无了。文革后出生者已经两代，他们一方面缺乏文革反人类反文明的惨烈恐怖的亲身经历，因而对毛泽东难以准确认识；一方面在不断重覆的洗脑宣传下竟对毛在文革浩劫中发挥得淋漓尽致的

¹ 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香港，《书作坊》出版社，2007年7月。

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手腕、我行我素无法无天的性格、冷酷无情蔑视生命伤天害理的品行不以为意，反而为他的“雄才大略”、“高瞻远瞩”、“不同凡响”而极度欣赏、崇拜。现在，这个发动并领导文革造成民族大灾难的罪魁祸首、公然宣称超过秦始皇“焚书坑儒”一百倍的毛泽东，竟又成为中国许多青少年心目中的头号英雄。

“共识”的丧失，最主要的，更因为当今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极其重大的变化。

1976年10月6日，时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领导惊天动地的“宫廷政变”，抓捕了毛泽东妻子和意中接班人江青及其一伙。但他由于主、客观等原因，却又以真正的毛泽东继承人自居，发誓要把毛创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事业继续下去。邓小平精明地抓住了华的死穴。华只“继续”了两年，就乖乖地被邓剥夺了继续“继续”的权势。而这位曾被毛谴责为“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曾经信誓旦旦“永不翻案”的邓大人确是中国政坛高人，把中国文化政治哲学的“模糊”特性掌握得炉火纯青出神入化。他以“三论”（“猫”论、“摸”论、“不争论”论）指导他的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得到确认的“改革开放”国策的贯彻实行。他把毛的“突出政治”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为纲完全颠覆为“突出经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能通过1981年《决议》把已经垮掉了的毛泽东重新树立起来为己所用。但是，邓小平的缺乏政治改革缺乏健全法律配套下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及“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思路，带来了今天中国贫富悬殊、道德沦丧、环境恶劣、社会撕裂的严重后果。从本质意义上来说，这也是毛泽东的文革后遗症。在这种社会生态下，毛泽东竟不可思议地成了被剥夺的社会底层民众和权势利益集团共同需要的神灵。

这里，让我们从头稍为回顾一下当代中国权势利益集团的“原始积累”过程。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如何清涟、胡星斗、孙立平……等人已经做了许多研究。

文革结束后，几乎全部曾经短期或长期被打倒的所谓“走资派”重新上台。在他们的荫护下，他们的子弟（有些是文革初期的“老红卫兵”即“权贵红卫兵”）作为“第三梯队”培养并随后逐步成为各级接班人。他们中，不少人吸取的经验教训是：“有权不用，

过期作废。”这些人千方百计利用手中权力捞钱，权钱交易越演越烈。在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掌握政治资本、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的总体性资本精英集团。从他们致富的实际过程来看，他们中的大多数不是依靠技术创新和产业化的过程而诞生，而是借助权力市场化，利用手中的资源配置大权，借助垄断条件的再生产来聚敛财富。全国收入增长最快的都是与权力相关的群体，实际上形成了一个有权必有钱的怪圈：以权力为中心，离权力越近的人越富，离权力越远的人越穷。

在这三十多年中，中国大致出现过四轮暴富潮。第一轮暴富潮是走私进口潮，最初出现于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的广东沿海，后来愈演愈烈。第二轮暴富潮发生在实行价格双轨制和企业承包制期间，“官倒”及承包者迅速暴富了起来。第三轮暴富潮是以土地和股票为主的投机热。第四轮暴富潮是卖完了土地卖企业，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这实际上变成一场明火执仗的抢劫。在这期间，专家们发现中国政治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三者之间的可转换性。他们称之为“圈内转换”。典型的就“不落空”现象：在国家政权层面上总体性血缘资本代际交换，强化了不同资本的可转换性，换言之，在“原始积累”过程中的每一次资本转换和资源占有的风潮中，都没有落下他们，成为他们总体性资本积累的重要环节。

详考上述四轮暴富潮的来龙去脉，细查权贵资产阶级的“原始积累”发家轨迹，可以说无时无处不活跃着权力神通广大的身影。事实表明，贪官也好，贪官的亲朋好友和买通贪官的奸商也好，没有一个不是依靠权力暴富的。经济学常识告诉人们，权力不能创造财富，创造财富的只有劳动和资本。但权力却能够让人致富，而且能够让人一夜暴富，这是因为权力能够转移财富、分配财富，让财富从创造者的手中“搬家”到掌握权力或能够利用和买通权力的人那里。这就是依靠权力暴富的本质。经过不择手段空前贪婪罪恶的“原始积累”，中国出现四大非正义的利益集团：垄断国企利益集团、政府部门利益集团、官商勾结利益集团、身份血缘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的存在引发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方面一系列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容易结成全方位，又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其

利益取得的来源、方式和影响，全都不符合社会正义的要求。

古往今来，利用权力致富乃至暴富的可谓不乏其人，历代各国都有。但可以肯定的是，不论是在实行计划经济的毛时代，还是在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国家，权力都不曾成为也不可能成为整个社会最有效的暴富手段。为何在当今中国权力却能够具有和显现如此神奇的财富魔力？答案就在于中国这个“改革”的本身。

如论者所指出，邓小平开导的“改革”所建立的所谓“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实是一种权力市场经济，而权力市场经济最大的特点就是缺乏公众监督的政府对市场的强有力控制。正是政府的这种强势地位使权力在中国的财富分配过程中充当了决定性的角色，从而使权力产生了巨大的财富效应。更为恶劣的是，在当下的中国，由于权力对市场所具有的巨大控制力，寻租活动还呈现出一种恶性循环的趋势。由大规模的寻租发展到在寻租的同时积极地创租、设租，权力的财富效应变得越来越大，贪官变得越来越疯狂，他们的钱包也变得越来越鼓。

三十多年前，当改革开放刚刚拉开帷幕，邓小平许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憧憬。然而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当人们从这场流光溢彩的财富梦中相继醒来时方才明白，所谓“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不是让一般中国老百姓先富起来，而是让权贵们先富起来，而且是让他们利用权力通过掠夺和盗窃人民用血汗创造的财富暴富起来。

这就是2006年4月开始在网上流传的那份《全国地方党政部门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薪酬和家庭财产调查》的调查统计结果——中国的亿万富豪，90%以上是高干子女。或据2012年6月19日北京《人民政协报》官方的报道，0.4%的人掌握了全国70%的财富。实际上已形成了一个权势和钱势都如日中天的官僚特权阶级。

这些年来，中国大陆贫富差距悬殊引起许多有识之士关注，他们提出不少有关调查研究报告。联合国曾估算，2011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将突破0.55。中国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于2012年12月公布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则指出，2010年中

国家基尼系数为0.61，远高于警戒值0.4，显示“当前中国的家庭收入差距巨大，世上少见”。这份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大陆收入排名在前20%的人控制着68.4%的收入，但收入最低的后20%的人，仅控制着0.5%的收入。报告认为，中国大陆贫富差距问题非常严重，可能是世界各国之最。

特别是，由于政治体制存在问题，在权力精英和资本精英互相勾结的情况下，阶层出现“世袭”，造成官二代、富二代和穷二代、农二代的利益固化。这种社会阶层的分化对立日益严重，造成草根阶层失去向上流动的可能、中等收入阶层产生严重的被剥夺感、新富阶层则出现严重的移民倾向。

社会阶层出现“世袭”这个结论，也得到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承认。它在2013年5月26日发文谈论中国农村教育问题，称：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底线，农村孩子弃考传递出一个信号：底层上升通道受阻，“社会阶层固化”趋势加剧，贫穷将会代际传递，“一代穷世代穷”。许多社会调查证实，贫富悬殊的社会阶层形成，撕裂定格，再也难以逆转了。阶层的固化比贫富差距对国家的伤害更为严重。

今天中国状况，应该说邓小平是始料未及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当邓小平多次发表他的“一贯主张”——“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时候，他并没有忘记“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但是，历史的确经常开玩笑作弄人。由于自身的局限以及国内外形势的影响，邓小平下不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而没有政改没有健全法制的保障，他这个“大原则”就始终无从得到切实执行；后来，在1989年“六四”之后，他又陷入了“毛泽东之忧”因而错上加错。毛死前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建国与文革，都没有做完；最忧虑的是他的文革决策在他死后可能被否定因而将声名狼藉。邓小平的后半生最主要的是两大决策：改革开放和六四镇压。下令开枪的恶名很难摆脱，他只能依赖改革开放政策来保住声望名誉。1992年年初，邓小平不顾老弱之躯毅然南巡，以挽救“六四”后在批判“和平演变”的浪潮中大有可能被冲垮的他的改革开放政策。在南巡中，他进而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一时真是“东方风来满眼春”。但是，他这个响亮口号，由于缺乏社会正义

的保证，更让权贵利益集团乘机加促了发展势头。改革开放脱离了初始的运行轨道，既得利益集团迅速掌控了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命脉。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这个国家在不知不觉中被既得利益集团所垄断，连改革依赖的路径也被既得利益集团所把持或控制，变成了一种不受监督、不受制约、不需要全民共识的官僚利益集团和垄断利益集团双赢的格局。这样，邓小平的六四镇压不但以完全逆反的连锁效应导致苏东欧国家天鹅绒革命并最终引向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的解体，也致使中国成了世界上唯一的而且是空前奇特的共产大国——既声称信奉谋求穷人解放的马列毛主义又被权贵利益集团绑架了整个国家。

今天，虽然“改革开放”国策极大地提高中国国力，让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但是，社会上大量底层民众，那些被剥夺被损害者，并没有感谢邓小平，反而怀念那个他们认为的“虽然人人贫穷但却人人平等”的毛泽东时期。这毫不奇怪。翻开邓小平历次讲话记录，他自己已有话在先：中国如果出现了千万富翁，亿万富翁，我们的改革就失败了，我就成了历史的罪人！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非常不幸，三语三中，全部成真！

**四，当今中国，各种社会思潮斑驳杂乱，纷至沓来，特别是毛左思潮
与反毛左思潮，尖锐对立，不断剧烈争论交锋。由于党国体制
决定性的影响，毛左势力坐大，毛泽东奇特地成为社会底层被剥夺
被损害者和掌握了政治、经济大权的权贵利益集团共同需要的“尊神”。**

1976年文革宣布结束时，可能所有的中国人都想象不出，几十年后的中国大陆竟然如此社会分化，贫富悬殊，贪污腐败，道德沦丧。与此同时，作为社会生态的重要反映，各种社会思潮竟然如此斑驳杂乱，纷至沓来，不断剧烈争论交锋。马立诚在他于2012年1月出版的《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一书中，对这些流行于当代中国的社会思潮进行了梳理，归纳为八种，即邓小平思想、老左派思潮、新左派思潮、自由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

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新儒家思潮和民粹主义思潮。这八种社会思潮是在当前语境下能够在大众传媒上公开进行论述和博弈的思潮，不是社会思潮全部，特别是排除了那些极端主义与分离主义的暗潮，文革后公开影响民间社会生活的基督教思潮也没有包括在论述对象里。当然，此书也来不及论及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习近平上台后出现的新思潮。可以说，近年来思潮非常之多，多到十几种，二十几种。

中国老左派就是以“毛泽东晚年思想的捍卫者”自居，认定毛泽东具有无可置疑的“晚年正确性”，而不是什么“晚年错误”。邓小平上台后三十多年来，据马立诚考察，他们先后发动四波进攻，其决绝性一波高过一波。第一波，是围绕“两个凡是”与真理标准的交锋，主要在政界高层展开。第二波，是1989年“六四”过后，老左派认为清算改革开放的时机来了，就是要“问一问姓社姓资”，矛盾直接对准邓小平。第三波是四处散发“万言书”，前后四份，抹黑私营经济，以便影响公共决策。第四波，利用网络和海外媒体，迳直呼唤再来一次“文革”。

年逾九旬的前冶金部副部长马宾2007年自费印刷的《纪念毛泽东》，公然提出“彻底为毛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平反昭雪！”《乌有之乡》毛左写手梅俏同年所著《毛泽东的“珠峰”》，高调歌颂“文革”。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则在2011年6月15日为英国BBC撰文，极力为“文革”辩护，并在随后发表的《重庆模式成败与中国政治前景》一文中，大骂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广东。老左派甚至公开发表文章攻击咒骂党和国家领导人如邓小平和温家宝，甚至组织了几个挂着“毛泽东主义”挂着“工人”招牌的共产党，还曾经打算敬选薄熙来做他们的总书记。他们都没有因为这些应该是滔天大罪而受到相应的惩罚。今年文革五十周年，5月2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声称由中宣部属下机构作为主办团体之一的“在希望的田野上”大型交响演唱会，大肆为文革招魂。近万人出席这场声势浩大等于是宣战式的“红歌秀”。2016年5月16日，《5·16通知》下达五十周年之日，江青坟前摆放着拜祭鲜花。这些人要彻底否定改革开放。他们坚信：中国的腐败和民生等一切问题，都是邓小平走资本主义道路集团否定文革、推动资产阶级改

革路线造成的，如果不肯定文革就不会否定改革，而不否定资改路线，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和民生等问题。最大的腐败是路线腐败，反腐败不反腐败路线，不放手发动群众，不能根本解决腐败问题。他们号召：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紧紧抓住两个战略任务——破邓小平设计的资改路线；立毛式新社会主义——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毛左势力有新左派加盟为其添加时髦光亮的理论色彩。新左派他们不再热衷继承斯大林主义的苏联遗产，也很少操弄“阶级斗争”、“计划经济”之类话语，他们奉为至宝的主要是西方新左派如“新马克思主义”、后现代和后殖民主义理论。中国新左派不和老左一起唱“旧时曲”，反而打扮得很时髦，但他们共同之处不少：反“市场拜物教”、反全球化、反对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反对中国加入WTO、嘲讽与现代性相关的启蒙与理性精神，也有部分新左赞赏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人们说，新左派不是药方而本身就是一个病，一种时代病，其病症可以变得很快。例如，自从2008年提出“中国模式”之后，新左派一反过去对改革开放的质疑与批判，一拥而上盛赞“中国模式”，成了国家主义者。“中国模式”是毛左包括中国民族主义者津津乐道引以为荣的东西，无论如何，新左派是毛左最具眩惑力的打手。

毛左势力雄大还因为有强大的民族主义思潮和民粹主义思潮作后盾。现代中国有着滋长强大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丰富土壤；毛泽东起家就是靠善于煽动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今天中国以世界第二位的经济体傲视全球，民族主义情绪与时俱进也空前高涨。民族主义在中国主要是抵制全球化、反对西方；在世界上的作用是加剧了中国威胁论，加深中国和其它国家的紧张关系，绝不是中国的福音，但是它为毛左也为执政当局所喜欢欣赏也随时被加以利用。至于民粹主义，和毛左更有天然的血肉关联。老左派他们对与过去有着天壤之别的现实问题非常敏感，对底层民众疾苦关切，特别是对贫富悬殊、腐败丛生的现象进行激烈的抨击，有相当的民意基础。他们很多做法是煽动民粹，以司法不公、官商勾结等问题刺激中国的民粹。民粹主义特别看重、崇拜那些魅力型领导人，由此出现了毛泽

东热、文革热，前几年还出现薄熙来热。

但也有这么一种观点，就是鉴于中国实际上已形成了一个权势和钱势都如日中天的官僚特权阶级，几百个既得利益集团垄断着或者说绑架了整个中国，所以权贵集团是中华民族包括自由派和毛派的共同敌人，自由派和毛派应该联合起来对付之。这种观点认为，自由派和毛派之所以纠缠不休，相互为敌，是各自存在一些重要的认识误区。概括起来说，不少自由派纠缠历史，恐惧毛泽东和文革，怕回到过去的毛泽东时代；一些所谓的毛派反对政改，恐惧民主和美国，怕走向“普世价值”的未来。双方为此无休止争斗，却稳定了最需要改变的今天，放过了他们其实要联合对付的共同敌人——权贵集团。

看得出，这里所说的“毛派”，不是和统治集团利益相关血肉相连的“毛派”，而是处在社会最底层的那些仍然把毛泽东看作“大救星”的广大中国民众。这种毛派，受压迫被剥夺，对社会不公、贪腐盛行愤懑难耐，倾向于民粹主义，期望再来一次文革，而且要像毛泽东所提出的，“七、八年来一次”。他们向往文革中的所谓“大民主”，想诉诸文革式的暴力运动以达到“翻身”。但是，这种思想意识，已经和今天时代趋势、和法治、宪政背道而驰了。他们的理念还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全然无视这个基本的事实：许多底层民众固然把毛泽东看作搭救人间苦难的天神，但是当前最需要通过请回毛泽东这个“精神教父”这个“尊神”来稳固自己的根基和既得利益的，却正是掌握了政治、经济大权的利益集团特别是那些“红二代”“赵家人”。在这个要害问题上，这些“毛派”和他们设想的“革命”对象竟是一致的。

毛左现在集结力量，要将12月26日毛诞辰这一天定为“人民节”法定节日。他们声称，建立人民节的自发运动，就是一场伟大的铸魂运动。在他们看来，当今中国社会的诸多问题，就思想方面的原因来说，悉为离开毛泽东思想的魂不附体所造成。毛泽东是人民领袖，是人民之神，是人民的化身。毛泽东把中国的一切全都打上了人民的烙印——人民政府，人民军队，人民法院，人民医院，人民铁路，人民邮政，人民银行，人民警察，人民教师，甚至连钞票都称人民币。在人类历史上，只有毛泽东创建的人民共和国把一切都

打上了人民的烙印，而正是因此，毛泽东是以人民领袖身份走进历史的，也必将永远定格在人民领袖历史丰碑上。毛泽东就是党魂军魂国魂民族魂！事实上，时至今日，毛泽东至今仍受到很多中国民众顶礼膜拜，在全国不少地方，毛庙堂里供奉着毛泽东神主牌位。

中共政权源自于暴力革命。按其传统来说，中共党人自然是左派；所有以“左”的名号打着毛泽东神主牌从事活动的都可以看作“自己人”，即使其见解有时不甚正确活动有时有些出格也不失为“犯了左倾错误的自己人”。疏亲一目了然。正如过去中国政治生活的一句老话常说：左是认识问题；右是立场问题。从对干部党员的影响看，左比右有更多的欺骗性；从国情和党情看，左比右有更强的易发性。这几十年来一些经济改革，也要“打左灯向右转”。左的危害太严重太可怕了。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谈话中基于当时改革成果极易葬送的严峻局面，讲了一句话曾经让很多人高兴的话：“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但是，今天再回头看看邓的这番话，防“左”实际收效甚微，极“左”思潮非但没有消弭反而时时表现更为严重。今天毛左势力坐大，是其表现也是其结果。其实，毛左势力背后一直有一个即使拉下人间还是神的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他这尊神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用枪杆子打出来的。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已经把邓小平“四项基本原则”规定为“立国之本”。

的确，在目前中国，不管多少思潮呈现、起伏、交集或碰撞、博弈，最主要的是毛左思潮和与之相对的反毛左思潮。两者非常不对称，毛左势力远远大于反毛左势力。或者可以这样的区分：“人权派”与“特权派”。这样，推崇普世价值、推崇自由主义、维护人权正义的有志之士可以在基本理念和民主社会主义以及其他思潮尽可能取得最大公约数，特别是，在维护人权正义的共同目标上可以争取并启蒙那些仍然把毛泽东看作“大救星”的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广大民众。

五，2016年2月，在文革五十周年之际，中国大陆发生了一场“十日文革”。

邓小平的“继续前进”加深了原本毛主义在各个领域的破坏；当今中国

各种问题，均可以在毛泽东那里找到源头，均是未得到彻底改造的毛建立的崇尚暴力、摧残人性的特权专制体制造成的。在文革后中国土地上，“中国病毒”产生，它不但祸害中国，也传染世界，对世界形成了一种另类威胁。

行文至此，不能不提到，2016年用工作之便 2月下旬，在文革五十周年之际，中国大陆发生了一个“任志强事件”，被史家称之为“十日文革”。

所谓“任志强事件”起自2月19日。这天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年后首次调研，分别视察了中共三大官媒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下午，习近平主持召开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并讲话，要求中共文宣官员要维护“中央权威”，“与中央保持一致”等。据多家官方报导，“党媒姓党”也是这次会议的说法之一。19日晚上，在微博上拥有3000多万粉丝的知名地产商任志强在微博发贴炮轰：“政府啥时候改党政府了？花的是党费吗？”还称“这个不能随便改”！“别用纳税人的钱去办不为纳税人提供服务的事”。紧接着，任志强又说道：“彻底地分为对立的两个阵营了？当所有的媒体有了姓，并且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时，人民就被抛弃到被遗忘的角落了！”22日近中午时分，任志强受批判后还发表微博称：“董事会受股东的委托代表股东管理、经营公司。但公司是属于股东的，不是属于董事会的。这是常识！”

2月22日，由北京市委旗下的《千龙网》首先发表题为《网友为何要给任志强上党课》、《谁给了任志强反党的底气》的两篇评论。用文革式的语言称任“简直就是党性的泯灭、人性的猖狂”。并把质疑指向任背后的领导：一个半夜三更喜欢给领导打电话的任志强，究竟谁给了他跳出来推墙的“勇气”？《千龙网》这两文被多家门户网站转载，并在首页显著位置刊发评论文章，直指任志强反党，并质疑其党员资格。2月22日晚上，中央网信办转载了《千龙网》发表的文章。就此事进行了表态。

对任志强的各种攻击如潮水般涌来。新华社的《新华网》以《乱放炮的任志强“党性”去哪儿了》；人民日报社的《人民网》以《任志强同志，你正在演出一场机会主义闹剧》

加入围攻的队伍；上海市的《东方网》指任是“8,000多万党员的耻辱”、对党“忘恩负义”、“处处抹黑、污蔑党”；共青团的《中青网》称任“用心险恶”、“妄议中央”、“违反‘国安法’”；《广州日报》谩骂任“甚至禽兽不如”；光明日报社的《光明网》称任为“颠覆势力代言人”。还有自称民间“爱国网民网站”的《察网》发表署名“崔紫剑”的文章，呼吁对任志强“依纪处理”，如有违法就移送司法。

2月24日，任志强在微博上发了《吕氏春秋》的一句话：“石可破也，不可夺其坚；丹可磨也，不可夺其赤。”第二天早上他透过腾讯微博，宣布他的新浪微博被封杀：“早上起来新浪的微博已经被关闭了。在这打个招呼！”

2月26日，中宣部主管的《党建网》刊文《党要管党任志强不能例外》，称：“党内的任志强们，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碗，中央必须狠下决心，依照党章和纪律处分条例把那些在党反党的人剔除出去。”

2月28日，中央网信办责令“新浪”、“腾讯”等有关网站“依法关闭”任志强微博账号，并表示绝不允许被关闭账号的用户改头换面再次注册。此举意味任此后难在网上再发声。

2月29日，北京西城区委下发《关于正确认识任志强严重违纪问题的通知》。通知称，要对任志强作出“严肃处理”。

至此，任志强应是必死无疑了。而且，受影响者不只任志强一人。2月25日，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三篇替任辩护的文章同样遭到封杀。此外，国家网信办近日还宣告对多位网络大V封号，包括@罗亚蒙、@演员孙海英、@王亚军上海、@荣剑2001、@文山娃等……近年来对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打压大有升级之势。

只是到了2月29日与3月1日，王岐山属下的中纪委机关报《中国纪检监察报》和中纪委网站先后刊发了一篇题为《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的文章，鼓励人们讲真话，实质是挺任志强，才风向大转。至此十日，在这期间，中国大陆各地争相表态，纷纷声讨，展开大批判，铺天盖地，劈头盖脸，用语之重，上纲上线之高，一时风声鹤唳，就像1966

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出现的局势。真是恍如文革重来！

在文革结束四十年之后，这个“十日文革”是如何得以发生的？究竟有些什么内幕？所有这些，一般人都难以深究。但这个事件，证实许多论者的判断：可能形式和规模不同，但类似文革性质的政治态势绝对有可能出现。或者说得更尖刻些：文革开始早在开始之日；文革结束于远未结束之时。

对照今天中国社会现状，世纪交接那几年的评毛批毛壮举，回想起来简直恍若隔世。这似乎不可思议，但又是合乎逻辑的发展。邓小平在他的重新竖立毛泽东前提下的所谓“彻底否定文革”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彻底”；而他的建立在不否定毛泽东的基础上的“改革”就只能是现在恶果越来越被看清的“改革”。但邓小平站在他的立场上别无选择——只有不否定毛泽东，他的治理、改革才具有合法性；只有轻描淡写毛泽东在前一个阶段只是犯了“错误”而不是犯了“罪”，他邓小平后一个阶段接着做的便不是惩治犯罪，而是“纠正错误，继续前进”。正是因为拒绝彻底否定毛泽东，这个“继续前进”很不幸地却加深了原本毛主义在各个领域的破坏——在民众价值观念、在生态环境、在整个社会结构、在民族人文传统，等等。今天社会存在的腐败、专制、暴戾恣睢、诚信缺失、道德沦丧、生态破坏、贫富悬殊、阶层固化……这些问题，均可以在毛泽东那里找到源头，均是未得到彻底改造的毛建立的崇尚暴力、摧残人性的特权专制体制造成的。

例如，毛泽东的文革最令人震惊的一点莫过于它的残酷，首先是对所谓“阶级敌人”的灭绝人性的残酷。旅美文革研究专家王友琴在《文革受难者》的前言里说了，大规模的对人的迫害，实际上是文革的主要场景，是文革的最主要的罪恶，就其规模和性质而言，可以用一个现在已经被普遍承认的术语来说，是一种“群体灭绝罪”。文革中天天发生的羞辱、迫害、游斗、抄家，当时人们都习以为常了，在湖南道县、广西，以及北京等地发生的大屠杀才比较骇人听闻。但当时的大屠杀的组织者和执行者都振振有词，理直气壮，自认为是执行伟大领袖的最高指示。在道县，他们就是声称在进行“第二次土改”，发出杀人指令的“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就是土改时期“人民法庭”的某种翻版，而施害者所采

用的对受害者们先开“杀人现场会”斗争、再宣判，后用“刀杀”、“沉水”、“棍棒打死”、“活埋”、“火烧”等方法处死，完全是土改杀地主的全套流程。人们在屠杀“政治贱民”的时候没有任何负罪感。这些从毛泽东早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都可以找出根据，更不用说毛在文革开初就有“要武”的倡导。而文革暴力现在在黑社会化的城管、警察的所作所为可以天天看到。在上述的“任志强事件”中，任居然被批判为“党性的泯灭、人性的猖狂”。真是一语道破天机！文革时倒正是“党性猖狂，人性泯灭”，专制暴力灭绝人性丧尽天良。

毛泽东视民众生命如草芥，他以阶级斗争为理论，鼓动暴力，制造仇恨，撕裂族群，不断地寻找斗争的目标，不停地挑起社会冲突。这一切，在文革中达到高峰，也表现在文革前的各种运动，如土改、镇反、反右、大跃进、社教、四清、三反五反……等等。他不断地掀起的暴力运动整治、残害了多少中国人？简直罄竹难书！今天社会充斥暴力，哪一个不是毛的暴力宣传结的果？今天那些官员对待人民生命和财产的态度，特别是其“敌对势力”思维，将维权律师、地下宗教、异见人士、网络领袖、弱势群体即“新黑五类”称之为甘受美国摆布而“渗透中国基层”、起到“滞缓或干扰中国崛起”作用的五种内部敌对势力，不就是毛泽东思想的延续吗？今年7月12日南海仲裁案裁决结果公布以来，越来越多的毛左愤青言论，充斥着对于生命的残忍、暴戾与冷血，也充斥着对于现代文明与秩序的破坏与漠视，类似“虽远必诛”的口号，一时甚嚣尘上。尤其令人震颤胆寒的是知名学者纪连海的那句：“战争如若真的爆发，中国即使牺牲十亿人口，仍然是世界上人口第二多的大国。”“牺牲十亿人口”论真可谓得到毛泽东那番“就是炸死一半人，还有三亿人，我怕谁？”的真传。

今天中国各地政府，执法机关，不守自己制定的法律规矩，甚至破坏法制，选择性执法，以权代法，干预司法，等等事例，天天发生，司空见惯，民众非常痛恨。长期以来，“党大还是法大”居然还是一个问题；司法独立，宪政治国，居然被一概否定。而蔑视法律，无法无天，在毛泽东看来不过小事一桩。早在中共政权建立之初，毛即把宪法和法律

看作一种工具，一种手段。他斥责有人“企图把党置于宪法的约束之下”；表示：“我从来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宪法，我就是要破除这种宪法迷信。”1959年，他在一份文件上明确批示：要人治，不要法治。文革大乱天下，是破坏党纪国法的登峰造极，毛还自鸣得意，1970年，他对美国记者斯诺说，他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特权、腐败和贫富悬殊，最为今天的中国人所谴责，有些人因而怀念文革时期所谓的“反特权”以及“人人平等”的生活。然而，事实真相是，当时人分三六九等，“黑五类”与“红五类”何来平等？！这种政治上的不平等正是最本质最可怕的不平等。讲到反特权，毛泽东恰恰是当时中国最大的特权分子。在那个全民禁欲、极端贫困的年代，毛泽东衣必特制、食必特供、住必行宫、行必专列，还霸占着一群女人，特别是掌控着全体国民的生杀予夺之特权。所谓腐败，并不止于贪图金钱美女，它的确切定义是以权谋私，无论所谋之私是财物女色还是权力地位。文革时期“政治挂帅”之下的腐败，最要紧的还不是以权谋财，而是以权害命。在文革中成长、升迁的那些“革命干部”，以及许多文革后官复原职的所谓“走资派”，经过文革“斗私批修”的“革命风暴”洗礼，往往官瘾权欲更强、贪婪之心更大。文革没有遏制腐败、消灭权贵，而是培植新权贵——今天权贵利益集团最早的基本成员。而且，贫富尊卑阶层固化，其实也起自毛泽东建制之日。毛以“打土豪、分田地”为号召，忽悠广大农民跟其闹革命，为其卖命，然而，他一旦取得政权，就通过“合作化”、“公社化”逐步让农民丧失土地的自主权、所有权；更通过农村户口制度让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世代困守在贫穷落后的农村。当今“一代穷世代穷”的阶层固化现象正是最令人心寒地集中表现在“农二代”身上。

现在中国社会，到处看到诚信缺失、道德沦丧、暴戾恣睢。有一个非常无奈的说法是：除了骗子是真的，一切都是假的。还有一个说法是：这是一个互害的社会。诚然，邓小平的缺乏社会正义保证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发展才是硬道理”加速这个势头，但毛泽东倡导的批判“封资修”、“破四旧”不是已经种下祸根吗？文革中，在“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狂热中，大家争相告密揭发诬陷，出卖亲师朋友，人人既是受害者

又是加害者。结果，毛成功地用专制暴力把人们驯化成奴才，又造成了一大群没有道德、没有约束、为了私利六亲不认毫无人性的人。这种全民素质退化经过好几代不但没有抑制反而变本加厉，因为权贵率先群氓紧随大家尝到甜头——不择手段竟然可以高速发财，一夜暴富。从1979年到2013年，中国GDP平均年增长9.8%，35年增长26倍。如何解释中国经济起飞的奇迹？北京清华大学秦晖教授认为是因为“低人权优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教授说的“后发优势”也有道理，依美华学者冯胜平之见，是“低道德优势”。冯胜平指出，文革之后，再无理想；改革之后，再无信仰。如果说，文革开启了以政治互害为特征的中国的全民互害模式，那么，文革之后，改革之后，互害模式进入到社会各行各业，现在，中国从全民政治互害模式变异升级到全民经济互害模式。就在这片信仰的废墟上，以腐败为核心的“中国病毒”应运而生，把人性之恶发展到极致。它透支的不仅是环境和未来，更是灵魂和良知。在崛起的背后，是肆无忌惮的盗版、举国风行的造假、创意迭出的骗术、不择手段的手段……树若无皮，必死无疑；人不要脸，天下无敌！

“中国病毒”是文革后中国土地上产生的一个毒瘤。在很多方面它像癌症，但又是能传染的病毒。明镜新闻出版集团总裁何频首先提出“中国病毒”的概念。他认为，所谓中国白猫黑猫的发展模式，正成为一种难以遏制的中国病毒，使中国陷入全面性错乱，甚至在全世界侵蚀自由的基石。中国病毒不但祸害中国，也传染世界，对世界形成了一种另类威胁，这是最可怕的事。

六，毛泽东确实不同凡响，只有他才能搞得起这么一个长达十年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现在，毛死后四十年来，毕竟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更不是与旧时可以同日而语，从各种形势推考，中国不太可能再出现另一个毛泽东，不太可能再出现另一个毛泽东领导的另一场文革。

毛泽东是个非常复杂的人物。你可以用许多词来形容他的为人：暴虐、专制、独裁、

多疑、冷酷、虚伪、好大喜功、嗜权如命、翻云覆雨……而且每一个词都可以找到许多史实来加以证明。不过，以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毛泽东兼职秘书李锐老先生的见解，知夫莫若妻，还是毛的第一任夫人杨开慧对毛的八字评语最准确，最传神——“生活流氓，政治流氓”。李锐为此写下三首“评毛”的打油诗：“生活流氓政治氓，贤妻早识太心伤；莫予毒也杀成性，培养奴才大黑帮”；“肖三一语三字夸，道破其人品太差；其乐无穷拼命斗，家亡国破竟由他”；“运动频频无限哀，人才不要要奴才；殃民祸国何时了？文革呜呼晓色开”。

与此相关，可以一问：为什么中国，且古今中外全世界只有中国，发生长达十年之久的文革大灾难呢？为什么文革结束四十年之后，造成大灾难的罪魁祸首还阴魂不散甚至被一些人尊称为“国父”为“党魂军魂国魂民族魂”呢？这真如林彪于1966年9月18日在一次接见时所宣称的那样：毛泽东“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毛主席是世界最伟大的天才。”毛确实不同凡响，既异於世界各国的共产党领袖，又不同於中国其他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进而论之，只有毛泽东才能搞得起这么一个长达十年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因此，可以得出另一个也许很有争议但很重要的结论：到今年九月九日，毛刚好死了四十年，毕竟，四十年来，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更不是与旧时可以同日而语，从各种形势推考，中国不太可能再出现另一个毛泽东，不太可能再出现另一个毛泽东领导的另一场文革。2016年2月“十日文革”之所以只搞了十日，可以说是一个小小的证明。以下再分别简单论述之。

毛泽东能够让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把自己神化起来。对他的个人崇拜在文革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早请示、晚汇报、挥舞“小红书”、跳忠字舞、学毛著“雷打不动”、“三忠于”、“四无限”、把毛的每一句话称为一句顶一万句的“最高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要执行……这些都是借鉴宗教手段达到毛泽东神化，让人顶礼膜拜，无比虔诚，不容任何丝毫的怀疑。在这方面，毛泽东超过恶魔希特勒和斯大林。今天，固然有人想搞个人崇拜，但还能够像毛泽东那样神化吗？

毛泽东自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延安整风运动确立他在全党全军至高无上的地位之后，一直把权力紧紧地掌握在自己手中。任何对他权力有潜在威胁的人，他都想法干掉、拔除，直到死前都不曾放弃。在他大病昏迷醒来后那一刻，他的总理周恩来第一时间对他说的话是：“主席，大权还是在你手里！”无限的权力欲也许是领袖的通病，但像毛泽东那样能够在文革中把全党打烂又把全党玩弄于股掌之中，可能没有第二人了。

毛泽东斩钉截铁不容置疑实行以党治国，又作了党的终身领袖。他的专政党组织严密等级森严且渗透整个社会，不经公民投票授权而垄断政治权力，高踞于国家、政府、社会和法律之上。文革时期，鼓吹“党的一元化领导”，“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对社会细胞控制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或说国家恐怖主义的程度，可谓空前绝后，在当今的社会生态环境里可能很难再度出现了。

毛泽东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他把古代专制帝王与现代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合二而一；他把一党专政与领袖独裁合二而一；他“君师合一”。他把自己的“毛泽东思想”定于一尊，确定为包罗万象并带有宗教性质的国家意识形态，成为党国事业的总体指导思想，强制全民信仰、遵守并将违反言行定为犯罪。在文革中，他居然成功地最大限度煽动全民意识形态狂热，让全民深信不疑他的思想包含人类全部真理及完美理想。在当今的中国，经济和文化领域已演变为半多元，社会思潮众多，要完全重新逆反实属不易。

毛泽东敢于公开声称他比秦始皇“焚书坑儒”厉害一百倍，敢于说“知识越多越反动”，整体上极端仇视知识分子。他治理下的中国，闭关锁国，信息封闭，让中国远离世界文明，从而把思想控制、愚民教育发展到极致，达到全民心甘情愿的地步。人人以非常感恩的心情“吃共产党的饭”，天天赞颂“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这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群众基础。今天思想警察虽然还是大行其道，但肯定只能得逞于一时而不能永远，在全球化地球村讯息发达的环境下，其成本将是越来越大，收效则越来越小。

毛泽东精通中国历代帝王权术。他一套整人的阴谋诡计逐年逐个把党内外对手不但打

倒而且让其痛不欲生。在如何可以让一只猫吃下一只辣椒的问题上，毛泽东不同于周恩来的用糖裹住辣椒喂猫吃的骗术，也不同于刘少奇的揪住猫脖子硬把辣椒塞进它嘴巴里的强干，毛是把辣椒剁碎碾成浆，涂在猫的屁眼上，因为太痛太难受，它只得不停地力图将屁眼舔干净。这位政治奇才让对手一世自我作践、生不如死的农民式智慧以及为人之恶千年无人能及。

毛泽东最善于利用人性的弱点，把内斗发挥到了极致。颇有悟性的林立果等人在《五七一工程纪要》中将文革形容为“绞肉机”。毛泽东让各种派系互相撕咬，包括权倾一世的“接班人”林彪也被绞得稀巴烂。文革中的所谓“大民主”、“群众专政”，是毛式另类统治手法，其无法无天的无比的威胁效力更无所不在更持久更恐怖。这是他的有别于其他共产国家的“伟大”创举。

毛泽东推崇“斗争哲学”——“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他的一生就是斗争的一生，不管是革命年代还是和平年代。他不但自己喜欢斗，还喜欢全民都斗。斗争的对象囊括一切，最后是曾经并肩作战的战友。文革是他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以复加的疯狂实践。而今天重提“阶级斗争”不啻是玩火上身自焚。

毛泽东祸国殃民的乌托邦理想主义让中国民众蒙受惨烈灾难。他好大喜功，急功近利，激进浮夸，无视客观经济规律，一次又一次把国民经济弄到难以收拾的地步。1958年搞的“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声称要“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结果酿成人类历史罕见的大饥荒，让三千七百多万人进入坟墓。但结果这些却都能文过饰非，甚至反而被认定是因为不按毛泽东思想办事而造成的。而今天，只要国民经济下滑到一定程度，社会就必然动荡，必然击发领导问责机制。

文革中，毛泽东把“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作为重要目标，造成中国传统文化道德的空前大破坏。“大破”之外，他还有一个“大立”宏图——“五七指示”（即他于1966年5月7日写给林彪的一封信）。在这个“五七指示”中，毛泽东对整个社会模式，即政治、经济、文化制度，都有构思宏大的“美妙”设计，要让全国各

行各业民众，包括军队，都生活在“毛泽东思想大学校”里，学工、学农、学军、批判资产阶级。这就是毛泽东心目中的共产主义蓝图，要在文革中强力推行。他这个“人类社会发展的长远计划”，完全与现代人类文明背道而驰，当时全国竟然无一人敢于质疑，而在今天，这只是茶余饭后的笑谈。

文革爆发前十年，毛泽东已经用“全盘公有制”剥夺了全民自由谋生权，用“城乡户籍制”剥夺了全民自由迁徙权。这个“全民枷锁制”让几亿中国人剩下的唯一活路，就是被迫在公有单位和人民公社里，“一切行动听指挥”地终身奉命扛活，谁也无处可躲，因为要解决最基本吃饭问题。毛泽东建立的这个垄断一切资源和分配权的超级极权制度，使得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追求自由解放的努力全部化为乌有，这也是广大中国人彻底断了“脊梁骨”的根本原因。按照著名文化学者易中天及其他一些专家的观点，这个毛措施是更甚于文革的滔天罪行，让中国一下倒退了2200多年，复辟到了井田制时代——“三年饿死三千万”就是这个复辟制度造成的直接恶果。今天的中国社会结构显然无法再倒退到毛泽东这个制度。

毛泽东为了要取代蒋介石统治中国，敢于在抗日战争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关头指示他的党“一分抗日，二分敷衍，七分发展，十分宣传”。更为令人发指的最新资料见于东京福祉大学国际交流中心主任、筑波大学名誉教授远藤誉博士的新书《毛泽东勾结日军的真相：来自日谍的回忆与档案》（中文版，明镜出版社，2016年6月17日）。这位在中国长春出生的日本学者，一直反对日本侵华战争，她在此书披露，抗战中毛泽东为削弱国民党军队的力量，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背着其他中共领导人偷偷派人勾结日军，把从国共合作中获得的国民党军事情报出卖给日本。对于毛泽东来说，为了胜利完全可以不择手段。

毛泽东又能以“爱国主义”之名极大地煽动中国人的民族主义。他让中国人深信不疑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着中国人民去解救！他让中国人既相信“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又相信它“亡我之心不死”。他打了朝鲜战争后多年来一直和苏联站在一起把美国当成头号敌人，后来又与苏联撕破脸，生前的最后几年更着手联美制

俄。他要打倒“苏联现代修正主义”，企图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要超过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他提出“三个世界”理论，要以“世界农村”包围“世界城市”，打人民战争，进行世界革命。他不断输出革命，妄图打出一个红彤彤的无产阶级新世界。他不但要做中国人民大救星，而且要做“全世界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这个极度狂妄发昏的“巨人”，今天谁能学习！？如何复制！？

七，虽然毛泽东那样的枭雄不太可能再现，虽然另一场完整意义的文革不太可能发生，但人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解决当今中国社会问题唯一之途是深化开放改革，实行政治体制改革，说到底，还是绕不过评毛批毛。正如许多论者所提出的那样，方向是：“腐尸出堂，头像下墙，批毛正史，促进宪政。”虽然这些做起来谈何容易，但时不我待，目前中国已经到了改革与革命赛跑的时刻。

毛泽东这个开创自己的时代、发动史无前例的文革、自认为可以指点江山、可以改变历史、可以改造人性的枭雄，这个“世界最伟大的天才”，是中国人的宿命和孽债。虽然他一死，他那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马上就灰飞烟灭；虽然他晚年最信任的人——老婆和侄子——在他死后不到一个月就锒铛入狱；虽然如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先生早在文革刚起之时就准确预言，他是在玻璃板上画画，一场大雨过去之后，就会被冲得一乾二净；虽然他最后被历史所捉弄，不过是黯然收场，因为他那套反人类、反文明的文革做法注定不能得逞，然而，在经他奠定的中国社会制度环境下，他的幽灵至今还在中国四处游荡；毛思想、毛体制仍是支撑现政权的基石；很多受改革开放损害的底层民众，仍然把希望寄托在毛身上；中国还得要继续被毛的梦魇所缠绕，时间还可能相当长。

但是，无论如何，这种状况到底还是要改变。首先，虽然毛泽东那样的枭雄不太可能再现，虽然完整意义的文革不太可能发生，但人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还要认真面对这些严重问题：中国社会转型，中国改革开放事业，还要不要继续进行？三、四十年来由于政治改革的缺失以及其它失误所带来所积累越来越严重的社会矛盾社会冲突要不要刻不容缓

去解决？中国执政党要不要取得执政合法性？要不要恢复公信力？……等等。而这一切，怎么也不能绕过评毛批毛这个关口。正如邓小平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就心知肚明：毛泽东难题始终要解决。

一些反毛左的“救党派”如前述的辛子陵大校提出一种“救党”办法——“切割论”。他说毛泽东有五条严重错误和罪行，别人是无法替他分担的：一，一个人推翻了七届二中全会形成的计划要实行十五至二十年的新民主主义治国路线，于1953年开始搞所谓“三大改造”，动摇和消灭私有制。二，一个人推翻了“八大”务实的经济建设路线，在1958年强制推行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造成社会大破坏，大饥荒。三，一个人以秦始皇自居，以“焚书坑儒”为乐，1957年将55万爱国知识分子打成“右派”，制造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文字狱。四，一个人发起个人崇拜，巩固终身制的执政地位，重用自己的亲属，建立家天下。五，一个人公然违背宪法，发动“文化大革命”，造成中华民族的空前大灾难。

这些“救党派”认为毛泽东已成了中共的“负资产”，应该切割抛弃。

许多有识之士包括自由主义学者也早已指出，直到今天，中国政治改革之所以停滞，社会问题和矛盾之所以严重，就是因为没有真正彻底评毛批毛匡正历史罪过，被沉重的历史包袱压得难以前进。毛泽东的以党代政、个人崇拜、不讲规则、愚民洗脑、人身控制、不容异见、践踏法律、残酷斗争、群众运动以及户籍制度、劳教制度、国有制度、官僚制度、人治制度、文字狱制度等影响深远，严重地阻碍了当今中国政治与社会的健康发展。他们的方案是：“腐尸出堂，头像下墙，批毛正史，促进宪政。”

当然，有人另有想法。在文革五十周年之际，著名毛左司马南发表一通谈话。他把毛泽东主持起草于1966年8月8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喻为“1号文件”；把由邓小平主持起草于1981年6月27日发布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喻为“2号文件”。司马南呼唤“3号文件”尽早出台。他认为“新一届中央对文革其实是有说法的”，习多次提到“前后30年不能相互否定”以及“探索性失误”的概念很好地将革命、文革、改革几段历史统一了起来，假如出台“3号文件”，习的认

识必为主基调。关于这种“统一”，司马南有个形象说法：“毛小平”——“毛”是毛泽东的“毛”，“小”是邓小平的“小”，“平”是习近平的“平”。他干脆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元理论、根理论”，“没有离开老根儿独立存在的什么邓论、习论”。

2016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再过五年，中共将正式成为一个百年大党。在庆祝中共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发表讲话，呼吁党员“不忘初心”。习总书记不会没有想到，讲到中共“初心”，人们一定马上记起上世纪四十年代毛泽东那些信誓旦旦的“诺言”。

那时，毛泽东承诺：“有人怀疑共产党得势后，来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制，这是不可能的，我们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等自由。”

那时，毛泽东大力鼓吹民主自由。他极其正确地指出：“自由是人民争来的，不是什么人恩赐的。……没有人民的自由，就没有真正民族的国民大会，就没有真正民选政府。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

那时，毛泽东有声有色有理有据批驳“民主难行”论，指出：“有些人说：老百姓没有知识，不能实行民主政治。这是不对的。在抗战中间，老百姓进步甚快，加上有领导，有方针，一定可以实行民主政治。例如在华北，已经实行了民主政治，虽然还没有做得彻底。在那里，区长、乡长、保甲长，多是民选的。县长，有些也是民选的了。”

那时，毛泽东对中国历史上那个“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从兴旺到灭亡的周期律不以为然，欣然对应：“我们已经找到一条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那时，毛泽东甚至说到这个地步：中共“不是求达到苏联的社会与政治的共产主义”；中共在政治上“既不要求也不计划无产阶级专政”；“我们也不主张一个足以沮丧个人创造性的集体主义”；“我们信仰与实行民主政治，……限制任何一党专政的可能性”；“我

们不再是苏联所谓共产党这个字的意义了”。

.....

毛泽东后来所做的所有事情，完全与他当年所作的这些诺言背道而驰，中国人不会遗忘，更不能原谅。

论者感叹道：毛泽东在延安所畅想的民主之路在他执政掌权后，并没有让执政党去尝试，更不用提让人民当家作主。一直到今天，人民都还没有尝试过用选票来选择任何一个领导人选择任何一条政治道路。意识形态领域仍然纠结于中国走老路还是走新路抑或是走邪路。中国依然没有走向当年所畅想的民主之路，这是历史的宿命，还是中国的劫数？！

文革结束时，曾作为中央组织部长的安子文，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谁来监督毛主席？”风雨苍茫四十年，这个“谁来监督”之问，依旧没有答案！

人们感觉到，毛的头像一天不从天安门城楼墙上取下来，文革那把达摩克利斯之剑，还是时刻悬挂在中国民众的头上。

上世纪八十年代，时任中共总书记的胡耀邦曾说：“我们要使我们的国家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怎样的国家是“正常国家”？相信人人都心里有数。胡德平在他的《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一书中披露，胡耀邦经常讲，认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为之而奋斗的同志是革命家；过着默默无闻、浑浑噩噩奴隶生活的人是奴隶；身为奴隶还赞美自己的奴隶生活的人是奴才，是无耻之徒。而今天，无耻之徒何其之多！

中共元老习仲勋，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期间，针对社会上普遍不敢说真话，特别是针对“如果今后又出现毛主席这样的强人怎么办？”这个问题，大力主张言论自由，提出制定一个《不同意见保护法》。可惜习老这个遗愿至今未能实现。今年7月17日，习老曾经题词称赞“办得不错”的著名敢言刊物《炎黄春秋》也被迫宣布停刊了。杂志社被以文革方式占领，律师诉诸公堂亦不被受理，法律无力约束权力的专横。真正不忘初心的《炎黄春秋》遭致命偷袭而轰然倒地，代价高昂至此，宁不令人寒心？

面对现实，思考历史，显然，对宪政民主的呼唤，对人类进步共同方向的认同，是当

今时代的最强音。

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南都观察顾问孙立平于今年6月28日在腾讯思享会夏季论坛上说，他最近一直在说，这几年可能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最让人困惑的一段时间，而且这个困惑好像跟原来有点不一样。最现实、最眼前、最急迫的是什么？他认为，从最虚的层面来说，就是三方面：国家的方向感、精英的安全感、老百姓的希望感。孙教授指出：“现在社会要进入一个新的三十年。这个新的三十年应该建立在过去那两个三十年认真反思的基础上，从而提出具有超越性理念。这个理念，应当体现出对过去两个三十年的继承与超越，应当体现出十三亿人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应当体现出人类的普世价值，应当体现出人类进步的共同方向。这几年我一直在强调公平正义的问题，就是想对这个问题有所讨论。”

著名的“皇甫平”系列评论作者、《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现凤凰评论家周瑞金，于今年7月12日以“皇甫欣平”笔名发表《文革反思万言书》。他明确提出，“深化改革的方向，一言以蔽之，就是用依法治国来取代以党治国。”文章分别论证：阶级斗争思维错了；民主政治是新型国家建立的逻辑基础；不能把法律当统治工具；要以开放心态对待各种社会力量；结束以党治国从依法治国开始。该文分析道，以党治国的另一个后果，就是拒绝甚至压制其他社会力量的参与，这使得执政党难以成为问题的解决者，而成为问题本身。周瑞金恳切呼吁：“民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之一。民主不应该只是一个口号，而应该是精神，更应该是制度安排。民主最根本的体现，是宪政框架。是否能够把执政行为置于宪法的框架之内，是民主与否的试金石。”

人们问道：不是已经制订了一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吗？既然在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确立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就应该大力反对并摈除“贫弱、独裁、野蛮、动乱”；既然在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确立为“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就应该大力反对并摈除“专制、失衡、不公、人治”；既然在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确立为“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就应该大力反对并摈除“卖国、懈怠、欺诈、凶恶”。难道这些仅

是纸上谈兵吗？

当然，这些做起来谈何容易！2012年中共18大后，习近平铁腕治贪反腐，给官僚体系带来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目前，最具刺激效用的腐败催化剂受到限制和遏止；在经济放缓且颓势难挽下，GDP数字不再是官场业绩的最重要标示，因而曾推动官员“积极有为”的动力消失，许多官员怠政掣肘，为官不为。另一方面，治标不治本的反腐以及选择性反腐也受到质疑……

据分析，今天中国利益集团主体各级官僚，有三个特性：第一，信仰上，只信利益，既不信普世价值，其实也不真信“马列毛邓三科”；第二，基因上，传承自红一代，崇拜实权，忽视人权，转型成佛的可能性较小；第三，人格上，属于分裂型，一边在西方法治国家将自己的子女和财产安排好出路，一边向国民宣传西方是罪恶的；一边宣扬共产党人没有自己的利益，一边拒绝财产公示。

一些红后代，为了维持红色身份以便于捞取特殊利益，不仅否认毛时代造成上百万知识精英被杀害和数千万无辜平民的非正常死亡，甚至还否定毛对自己父母叔伯亲戚的极度侮辱和残酷迫害，转而站到为毛开脱乃至讴歌的阵营之中，大搞历史虚无主义，反将帽子扣到历史觉醒者的头上。凡此种种，表明他们在信仰上、基因上以及人格上存在重大缺陷，很难走上真正的宪政之路。

而且，对待政治改革这一重大问题上，执政党必然会有许多制约和考虑。如许多论者所归纳，第一，改，有可能动摇国本；第二，改，有可能对现有的既得利益集团形成巨大冲击；第三，改，意味着对重大历史遗留问题的清算；第四，改，意味着传统治理模式的重大调整；第五，改，会出现对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考验；第六，由于政治的惰性，现体制只要还能维持就不会轻易改变；以及第七，由中国传统文化和国民性所决定，再不堪的体制在中国都有可能存续较长的岁月。这里有一种历史的惯性。

但是，能无限等待下去吗？依许多有识之士之见，目前中国，是“已经到了改革与革命赛跑的时刻”。北京著名学者陈行之先生指出，如果国家政治进程不能通过政治妥协达

到政治和解，社会矛盾将会持续累积，直至出现最坏的局面：民众的暴力反抗和“国家”的暴力镇压。所有这些耐人寻味的景象都曾经在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过，在几近相同的社会政治条件下，谁也不敢说这样的景象不会再度出现。而这正是中国当下的困境，一种暗淡的无解的国内困境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国际困境，中国和世界似乎都在消极地等待着随后将要发生什么事情。是的，极权主义无理性，谁也无法预料这样一颗失去轨道的行星下一分钟会发生什么事情，谁也无法预料。（陈行之，《中国特殊利益集团的国家权力特征》，刊于《共识网》、《爱思想》、《博客中国》等网站。）

而这不但关系到中国国民的福祉，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安危。

此刻，人们也许应该深思二十世纪政治思想史上的瞩目人物、美国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在《论革命》一书中的观点。她尖锐地指出：

“革命的暴力只能使用一次，如果革命后不建立一个有效的民主的法律与制度，就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就会进入一个循环往复的继续革命的阶级斗争暴力运动之中，并且不可逆转！”■

2016年7月

【读书】

满纸荒唐言 一把辛酸泪

——读项德宝《“文革”牢狱之拍案惊奇录》

何丹尼¹

最近有幸拜读了项德宝先生大着《“文革”牢狱之拍案惊奇录》，情不自禁地也拍了一下案，惊了一回奇！

¹ 1964年生。文革后于1980年入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有幸于著名古典文学教授马茂元先生门下攻读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从事古典文学教学与研究。1992年初来澳洲。发表文字约八、九十万字。平生服膺诸葛武侯之名言“宁静以致远，淡泊以明志”。

项先生 1960 年毕业于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大学），是一位资深法学专家。其生涯穷通交替，大起大落。困穷时在文革中含冤入狱年复一年，运来时他非党非军人，却被邀请任解放军总参谋部法律顾问处法律顾问，法庭上唇枪舌剑，睥睨群雄。来澳洲后，在雪梨和香港多家媒体上发表了一系列法学论文。其立论之深刻，论据之坚确，逻辑之严密，辞锋之犀利，引人注目，影响深广。然而，此书是一部纪实文学书籍，文学与法学毕竟风马牛不相及，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也决不是孪生兄弟。没有想到他一反尖利长枪冲锋陷阵之常态，竟以三寸小刀精雕细刻出一部精彩的文学作品。

其精彩之处，首先在于作者以自身牢狱生涯为经，以狱友案情为纬，纵横交错相互映衬，既写出了惨不忍睹的牢狱生活，更描摹出社会上各式人物之众生相，而重点在于从牢狱生活这一特定角度，折射出文化大革命的严酷惨烈。

十年浩劫冤狱遍地，林昭、张志新、遇罗克等英烈先贤事迹已传诵人口。但本书中揭示的并非是大义凛然的英雄，而是身不由己被卷入政治漩涡的草根百姓。其情由之荒谬、获罪之古怪，不入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实在是湮没了这些今古奇观。

其一，为一梦做成十年牢。一个小青年父母在美国，他在梦中坐船出海，又游泳潜行。幸好遇到外国轮船相救，终于来到美国重逢父母。不料他兴冲冲向知心好友讲述梦境后，竟被好友告密，于是保卫科干部义正辞严：“你日有所思才夜有所梦，你做梦都要去投靠社会主义祖国的敌人，证明你的叛国投敌反动思想根深蒂固。你用说梦话的手法向臭味相投的知心朋友传授犯罪经验，教唆同事叛国投敌游水去外国，既有思想又有行动，是彻头彻尾的现行反革命罪行”。革命有理，做梦有罪，于是这位“梦兄”以反革命叛国投敌罪，判刑十年。

其二是英国间谍案。主角是上海厨师，1949 年随着东家英国怡和洋行女大班去香港，但女儿留在浦东乡下。公安局安排下鳌鱼吞钩计，让他女儿出面写信，叫老爸回国探女。厨师回上海时顺便受东家之托，探望她的老同学，七十多岁的英国孤老太。不料一顶早就安排好的“英国间谍”帽子不偏不倚地落到了他的头上。罪名如何落实呢？英国孤老太的

丈夫解放前就病死，并下葬在上海。于是公安局分析得头头是道：他打着到各地画画的幌子跑遍中国，目的是要去各地搜集情报，他死了还要侵占中国土地，葬在上海万国公墓是为老婆打掩护，给她留在上海继续潜伏找借口，以便进一步搜集情报。厨师大惑不解，七十多岁孤老太怎么会做间谍？公安环眼圆睁，怒发冲冠说：“英国是老牌间谍国家，做间谍的人一直要做到死，没有退休的。英国老太婆只要有一口气总归是间谍。而且很多是全家老小一齐做”。于是厨师成了奉英国女大班之命，来上海与英国间谍孤老太会面，以刺探情报，这一大案彻底破获，又是文化大革命一伟大胜利。一头雾水的厨师以间谍罪判刑20年。

其三是打破世界纪录的幼年反革命犯。三个五、六岁的顽皮小儿，尽管出身贫农家庭，千不该万不该把印着红太阳“宝像”的报纸，或者加上眼睛框或者添上大胡子，更有甚者作弹皮弓的靶子，纸弹纷飞报纸四裂，三个小捣蛋自然是批斗示众。更可怜的是其中一个老爸，为帮小鬼毁尸灭迹，把这些碎报纸一火了之。于是这个老贫农犯下两项滔天大罪：一是包庇三名小现行反革命；二是对毛主席、共产党恩将仇报，刻骨仇恨，火烧印有“宝像”报纸。幸亏他出身贫农，认罪服法态度好，才法外赐恩，从轻发落给他轻轻判了个十年徒刑。

老贫农烧报纸还算事出有因，更有人横遭无妄之灾。一老太太责骂家中小保姆，不料小保姆怀恨在心，暗生毒计。她把老太太一只鞋印在报纸“宝像”上，然后赶去报警。“宝像”上鞋印历历在目，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构陷大功告成，老太太判刑五年，角落里笑坏了小保姆。

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它们清楚说明了为什么文革十年是浩劫岁月、荒谬时代。苛法重刑之下的鲜血与烈火，原材料竟是千奇百怪的冤屈灵魂。

书中另一引人入胜之处，是披露了大量狱中的奇人异事。“四朝元老”是书中一个重要人物，其生平就是一部扒手泰斗传奇。早在二、三岁时，就被雌雄贼抱在手中，专门盗取他人上衣口袋中的金笔、挂表。对方不察则手到擒来；对方发觉，则托词小孩无知，顽

皮不懂事，照样安然脱身。然而上得山多终遇虎，三岁时就和贼“父母”一抓进提篮桥，称得上是史无前例的最小刑事犯。一生中历经英国佬、日本鬼、国民党、新中国四朝牢狱，故称“四朝元老”。他最辉煌之战绩，是在一次失手由看守所转送监牢时，吉普车上，尽管他双手反铐，左右二名警察贴身看守押送，他却乘二警瞌睡朦胧时，轻轻松松脱去手铐，把两个警察口袋中钱包、钥匙甚至手表一一囊括无遗，然后再把自己铐上，两名警察居然一无所知。直到进了牢狱彻底搜身，才事件败露，此事惊动了公安部。重组案件，全国通报，并特别重判无期徒刑，监中称“遥遥”，遥遥无期者也。一战成名，成就他在提篮桥中的无上名声。

狱中犯人有没有绝食自由？会不会送去吊葡萄糖、盐水？狱吏们一不用耗费国家药物，二不用花费医生精力，他们自有雄踞世界之巅的反绝食绝招。“在政府队长一个手势下，一个劳动犯按着绝食犯的双手，一个劳动犯擒住两脚，一个劳动犯一手捏住他的鼻子，同时拿出预先准备好的一合子约二、三两的粥。当地下躺着的绝食犯人，为了生存需要呼吸，自然而然张开嘴巴时，劳动犯将合子里的粥，熟练地一口一口地准确、及时、不疾不徐地倒进了他的嘴里”。绝食梦碎，求死不得。然而还有好戏在后面，名曰“以饿治饿的革命人道主义”。队长每天依法炮制，灌你二两、三两粥，几天下来，饿得你前胸贴着后背，但又绝对死不了。你只能磕头求饶。发誓赌咒再也不敢绝食了。又过了若干天，政府队长这才皇恩大赦赐你正常的两粥一饭。作者慨叹道：台湾前总统陈水扁贪污入狱后，几次三番搞绝食，全球电视实播入医院、吊葡萄糖、盐水抢救不迭。作者笑称：“如果两岸交流了对付监所中嫌犯或犯人的绝食经验，按照大陆狱方传授的无产阶级专政下只此一家秘方，屡试不爽的‘以饿治饿的革命人道主义’办法，则陈前总统一类人及所有犯人的绝食秀，就是请他们演，谅必也没人敢粉墨登场了。”

其实从两粥一饭度日，到绝食以死要挟，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而绝食失败，苦苦哀求下得回的两粥一饭，看似回到原点，却是把人的最后一丝尊严打得粉碎，只剩下动物本能。

二粥一饭半飢半饱，本来就是大陆狱中常态。难怪有狱友坐过的“外国人监狱”，居然餐餐是大米猪脚爪，顿顿管饱。不由得所有狱中人心想神往垂涎三尺。作者没有神通穿越去朝鲜，但还是出尽法宝，冒着吃铐子的风险，把种种日用品与同监犯交换，一次凑齐四合薄粥，以求梦寐中的一饱。粥未吃，眼已饱，俨然成了狱中最幸福犯人。第一合粥入肚，有了半饱感觉，第二合居然回到飢肠辘辘状态。第三合涨到喉咙，按理应该收口停食，第四合，一口口拼死吞下，结果腹中火山爆发，吐得天晕地转几几乎一命呜呼。作者对此全过程用了大量篇幅，极细致极生动地描绘了心态、神情、举止、外部环境，是全书中人物刻划最具神采的部分。作者本人的欣快、贪婪、踟蹰、恐惧、不得不停又不甘停止，直至最后无可奈何、种种复杂交集心理如在眼前。刻划得如此真切、详尽，不是当事人岂能有此体验。笔者认为，追求一饱本来是日常生活中起码要求，但是在监狱这一特定环境中，起码要求却成了至高愿望，这本身已构成人性的扭曲，而为求一饱，不惜以死相拼，谋生却被舍身替代，这是人性的双重扭曲。

此书中披露的狱中内幕还有多多，如死刑犯最后一餐有没有酒肉相伴送他上路；手铐的新式老式及多种花式铐法；准确率达到88%的杀人犯面相特征……等等，等等。

作者写的是极惨极痛之事，但作者出于冷峭嘲噱、嘻笑讥刺之笔，读来常会忍俊不禁，但一笑之后更深刻地体验到的却是满纸荒唐言后的一把辛酸泪，可以说是大陆式的黑色幽默，地狱中的苦中作乐。

此书于去年圣诞正式出版，已有台湾、香港、日本、马来西亚、澳洲等地二十多个中文购书网站，特别是著名的香港商务印书馆网站以整页篇幅加以大力推荐，效果也算得上是轰动了。

值此“文革”五十年祭，希望读者们读了此书，抗拒遗忘历史，牢记这十年浩劫恐怖岁月，坚拒荒谬重现，这才是作者写作的初衷吧！■

【述 往】

久缠心头的“5·16”梦魇

——确实与金敬迈无关

冰 夫¹

人生如梦。痴活八十五岁，仍然天天如在梦中。如梦的生命，谁是主宰？长年纠结我心头的块垒，胎孕于历史断裂的碎片。

前些天，何与怀博士说正在编一本有关“文革”的书，稿件备齐，正待发排，唯一遗憾的是缺清查“5·16”的稿件，他曾听说我因金敬迈问题，在文革中被打成“5·16”分子，约我写篇短文。

记得一位北大教授曾言：“拒绝遗忘，抢救记忆，给那一段不堪回首又必须审视的岁月留下一些细节，脚注，也是在场者的证词”。我猜想这大概也是与怀兄编辑此书的本意。

—

史料记载：“文化大革命”期间，1967年9月8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中加了一段话：“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了这个办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组织。应予以彻底揭露。”第一次公开在报刊上提出要在全国彻底揭露“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于是从中央机关到各地方机关，曾发生自上而下大规模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运动。一时间，全国党政军机关、学校兴师动众，全力投入清查运动。

¹ 冰夫，原名王滢，南京江宁人。年少时参军，长期从事军中文艺工作，上世纪七十年代转业上海电影系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上海作家协会第4、第5届理事，诗歌委员会主任。上海俳句(汉俳)研究交流协会副会长。1996年定居悉尼。现为澳大利亚酒井园诗社创社社长及南瀛出版基金新诗评审委员会主任。著作甚丰，多次获得各种文学奖。

大约 1968 年初秋的一个上午，在歌舞团办公室，革委会副主任（原舞蹈队副队长）张某对我说：“上级通知，你和王群生去参加政治部举办的学习班。地址在铁道兵大院。王群生已经去了。”并说：“你的问题很严重，要如实交代，争取个好态度。”严肃凝重，好似面对罪犯。

于是我带了简单的洗漱工具等，骑着自行车到指定地点铁道兵驻地报到。走进营房大门，就被一种肃穆恐怖的氛围笼罩。一个配枪的士兵知道我是歌舞团来的，便将我带到一间办公室。我在门外立正报告。

“进来！”房里坐着军区保卫部的郭科长（外号郭黑子）。他原本是二科的干事。那时，我在文化部文艺科当干事，曾经一起参加助农劳动，又同在一个食堂吃饭，经常见面，本应很熟的。可如今，完全不同了。他狠狠直视着我，两眼透射凶光，冷冷地，足足一分钟，脸色方缓和一点，指旁边的一把木凳：“坐下吧。”

顿时，我仿佛被转换了身份，成了一个罪犯，坐在那里听他训话：“你的问题自己知道，如实交代和金敬迈的关系，争取个好态度。”我一时愣住了，禁不住自语道：“金敬迈和我有什么关系？”

“装什么糊涂！你去军委文革小组找过金敬迈吧？”郭黑子厉声喝问道。“看你这态度就不老实！好好反省去！”

于是，我被交给他的助手（我的项目组负责人）钟锋和诚子。钟是革委会成员（原话剧团演员），诚子是我们歌舞团学员队负责人。

他们将我领到一个的大房间，诚子指着一张木板床说：“这是你的铺位。你就在这里写交代。笔与纸在枕头底下。写完我会拿给你。”

钟锋两眼盯了我一会儿，指着我旁边一个趴在床边低头写交代的人说：“你们不准交谈，不准串供！”经他一说，这时我才注意到王群生就在我隔壁。王群生是我们创作组的诗人，曾出版过两部长诗。他平时为人谦虚胆小，此刻听钟峰一说，连忙站起来，高声说：“保证不交谈！”

钟锋为人阴刁狡黠，与舞台上演的反派角色颇为一致。文革初期，他曾数次联系，要我帮他揭发文化部王林亭副部长（因我在文化部当过干事，又曾跟随林亭部长去泰安市农村搞社教，比较了解他），我未同意。后来，各自参加了不同的造反组织。我在1967年初，因反对山东造反派2.3夺权，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在军事监狱关押30多天，虽然此后不久，便被正式平反，并由军区副政委陈美藻负责向我谈话道歉。陈在讲述一番道理之后，拉着我的手说：“共产党员要能经得起冤屈。我年轻时候，在红军中遭遇铲除AB团，差一点被拉出去枪毙了。”他真诚的话深深感动了我。对于这段往事，我也并未记恨在心。但是文工团革委会，特别是钟锋等造反派总对我有所防范与忌惮。

不久前，文工团（歌舞团与话剧团）家属区大院，有人发现了一条“反标”：在通往食堂的路边，有一张写着“打倒毛主席，拥护刘少奇”的纸条贴在砖墙上。全院顿时被惊慌恐怖所笼罩，军人与家属，人人自危，相互猜疑，惴惴不安。

在经过十多天紧张盘查之后，钟锋将怀疑恶毒的目光盯向我母亲。他曾多次找我母亲攀乡情拉近乎（我老家南京郊区，母亲讲乡下土话，钟锋是苏北射阳，能听懂我母亲的话）。有一次趁我和妻子上班时，他特地到我家里，找我母亲谈话，并拿出圆珠笔和纸，让我母亲写“毛主席万岁”、“打到刘少奇”，连写数张，送到保卫部去核对笔迹。因为他曾听邻居家的保姆说我母亲识字，会背唐诗。我母亲一直被钟锋当作书写反标的嫌犯。

现在军区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由钟锋负责我的项目，他对我怀有相当多的成见。我当日以继夜，澄心凝虑，思过自新。

二

从此，我便失去行动自由。吃饭，上厕所，均有持枪的士兵跟在后面。特别令我诧异的是，就在当天下午，我从厕所回来的路上，迎面碰到军区政治部秘书长辛矛剑，我当时一愣，本能地停下脚步，欲向他敬礼问好。因为他曾是我原来在烟台的单位76师副政委。哪知我还尚未张口，他却朝我微露苦笑，低头匆匆走过，原来他身后也跟着一个持枪的士

兵。后来我在饭堂里，又见到宣传部长朱兆丰、青年部长王洛、前卫报社胡社长以及刚从68军调来的新闻办公室赵主任等。无疑，他们也都被当作清查“五一六”反革命的嫌疑犯。

他们要我交代跟金敬迈的关系。我写的第一份材料就令钟锋大为光火：“这是你的交代？你太不老实了！”钟锋将我的材料呈送郭科长。郭看后令诚子将我带到他的办公室。我一进门，郭黑子板着脸，怒气冲冲地喊道：“你太不老实！在北京呆了29天，怎么就没有跟金敬迈见面讲话？这谁能信？！”我辩解说：“事实就是如此。”

他将威严的目光将我浑身上下扫视一遍，紧逼我说：“你不是会写文章吗？你把在北京的活动全写下来。”很快，钟锋就拿出他们命令我交代的提纲，共7条：

- 1、你为什么到北京军委文化小组去找金敬迈？
- 2、金敬迈都给你布置了什么任务？
- 3、你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认识林雨的？
- 4、林雨是福州军区造反派，你们都交谈过什么内容？
- 5、你与赵寰什么时候认识的？都谈了什么？
- 6、你在北京军委文化小组还见过些什么人？
- 7、你在北京期间还有哪些活动要向组织交代的？

于是，我回到大房间，趴在铺位上写材料，交代我去北京的经过。

金敬迈是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演员，因创作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一炮而红。受到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的赞赏，发行量近3000万册，仅次于《毛泽东选集》，创下当代中国小说发行量之最。后来他被江青看中，从军委文艺组调到中央文革小组，并派其接手文化部。但再后来，被抓进监狱。

我所以到北京找金敬迈，缘由是当初出现欧阳海之后，各部队纷纷刮起树立欧阳海式的英雄战士之风，如南京军区的蔡永祥。山东省军区也出现一位在津浦铁路的济南黄河大铁桥上，以生命维护列车安全的欧阳海式英雄王士栋。当时山东各报与解放军报大肆宣传，文工团革委会命我和王群生以一周时间写了一部歌剧，准备由臧东升（《东方红》大歌舞

中《情深谊长》的作者)谱曲。革委会又决定派李心田和我将剧本送北京军委文艺组审查。当时我们到了文艺组所在地——空军东四的一个招待所，接待我们的工作人员是赵寰，他告诉说：“金敬迈同志很忙，他不在这里办公。你们的剧本他一时看不了。我认为你们将剧本留下，他如果看了，有什么意见，电话告诉你们；或者你们留下一人在这里等。”

赵寰对人和蔼可亲，与我也有过交往。如果他能看剧本，对我们也会有所帮助。于是，李心田和我商量后，决定让我留下听取意见，他先行返回济南。因我有两个堂姐均住在北京。我三姐是海淀医院的牙科医生，三姐夫在军委高等军事学院（后改为国防大学）战略系任教官。

于是，我便暂时留住在东四空军招待所，等待金敬迈审查剧本。

赵寰是广州军区的著名剧作家，写过《董存瑞》、《南海长城》等名作，我们曾经见过面交谈过。那是1965年中南区戏剧汇演时，我跟随前卫话剧团陈戈副团长与吴导演参加华东代表团（由上海和江苏、安徽、山东、福建、浙江、江西等六省市和南京、济南、福州三大军区组成华东观摩学习代表团，团长由中共华东局宣传部长夏征龙领衔，南京军区著名剧作家沈西蒙和安徽省委宣传部郑副部长担任领队），前往广州观摩学习，为时20天，每天看戏、讨论，写心得体会。

在观摩学习期间，我和南京军区歌剧团创作组的石乐（本名刘荣贵），曾合作写出评红线女主演的粤剧《山乡风云》及广州军区话剧团演出的《英雄工兵》（万川编剧），两篇长文曾被《羊城晚报》以两整版分别刊登。汇演后期，又应组委会之约，写了《综述中南汇演的戏剧成果》一文，刊登于北京的《戏剧报》，反映颇佳。

后来在广州军区文化部开座谈会时，我们和赵寰、张永枚等人曾经交谈过。赵寰给我留下较深印象：他是北京燕京大学毕业生，又比我参加革命早，所以我对他颇为敬仰。赵寰先看我们的剧本，看后，他很坦率地说：“主题思想挺好，唱词也不错。你们两个作者都是诗人。但是我要说，整体看，比较概念，或者说有些公式化，不能让观众感动。”停

了一息，他又说：“当然还是等老迈有空，听他看了剧本怎么说。你们是来请他审查的。由他说了算。”

就这样，我一直在招待所等着金敬迈审查剧本。他的行踪比较诡秘，但报纸新闻中常有他的名字出现。

记得，在空军招待所还有福建军区的作家林雨，他以短篇小说《政治连长》、《五十大关》等享誉文坛，曾和金敬迈联袂出席北京“亚非作家特别会议”的特邀中国代表。后来，我们在江西南昌共同参加“支左模范李文忠”的宣传工作，相交甚为融洽。记得广州军区的诗人韩笑（当时他是海上文化工作队长）也曾在招待所住过。有一天，他告诉我，黄永胜司令员有专机回广州，他就跟这飞机走了。记得著名作曲家、沈阳音乐学院院长李劫夫一家人也在招待所住过，他是文革期间红遍神州的《大海航行靠舵手》作曲者，也曾为毛主席的多篇诗词谱过曲。他人很平和，没有大音乐家的架子，见面时总是笑着点点头。

另外，招待所还有几个文化人，记不起名字了。

在空军招待所等待期间，我经常到红山口高等军事学院三姐家去住几天。因为赵寰说，老迈一般是晚上来，他会预先通知。他确实很忙，现在又要管文化部那一摊子。

终于，有一天中午，我从高等军事学院三姐家回到空军招待所，当时感到北京政治气候似乎有些异动。赵寰告知：“这几天你别再去姐姐家，老迈可能会来。”

这一天快后半夜了，金敬迈突然来了，好像身后还跟着几个人，象是随从。赵寰也没有做介绍。当时，房间里气氛凝重肃穆，我只记得金敬迈神色凄然地说：“中央出事了。大家回去吧，各自回原单位。明天我也要回广州了。”当时给我留下的印象，金敬迈不像文化部负责人，而是一个普通作家或演员。

当时的情况很紧张，我也没有到红山口高等军事学院三姐家告别，第二天就回济南了。

不久，就听到传达杨、余、傅反党集团被揪出来的消息。1968年3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担任要职的杨成武（代总参谋长、军委常委）、余立金（空军政治委员）、傅崇碧（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被指“阴谋夺取空军大权”、“武装冲击中

央文革”、为“二月逆流”翻案，是“二月逆流”的“新反扑”。紧接着，王力、关锋、戚本禹也被揪出来了，据说，他们是“5·16”反革命分子的后台。

我将当时所能想起来的全写出来，交给项目组。郭科长和钟锋，他们看后，大为光火。郭说：“你这不是交代材料，你是在摆功！”钟锋指着我的鼻子，恶狠狠地说：“你在广州大出风头呀！你傲气什么？周扬黑店的徒子徒孙！”

从那以后，他们很少再叫我写交代。我知道他们已派人外出调查。钟锋则一再向我交代政策：“林副主席讲过：问题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

有一天，我又被叫到项目组办公室。推开门，只见房间里多了两个人：话剧团的李保明和罗士昌坐在靠窗边的椅子上。显然，他们是外调回来，要跟我核对材料。郭科长说：“你交代的材料，我们派人调查核对。你有很多假话。”

“我如实交代，没有假话。”

“你还想抵赖！”钟峰拍着桌子说：“我问你：林雨是怎么从福州到南昌的？”

“当时，宣传爱民模范李文忠，文道宏副政委主管这件事，是我向他推荐林雨的。”

“就这么简单？”郭黑子反问。

我回答：“他叫王秘书打电话向福州军区要的。”

“谁打的电话？”

“王秘书。”

“撒谎！睁着眼睛说瞎话！”钟锋沙哑的嗓子喊道：“告诉你，保明和老罗刚从福州回来。”他向李保明示意：“保明，你说说。”

李保明两眼直盯着我，慢吞吞地说：“我们在福州作了详细调查。看了电话记录，上面写着江西南昌来的长途，发话人是王灏。绝对没有错。”

“我确实没有打过。”我坚持保证。

郭科长两眼一瞪，怒气冲冲地喝令我端正态度，回去好好检讨。

钟锋在我走出房间时，又冷冷地说了一句：“告诉你，金敬迈早就关进监狱，赵寰也已畏罪自杀。你好好考虑自己的罪行。”

“我有什么罪行？”我又回到大房间，坐在那里抱头沉思。我真想不通：我只是奉命送剧本到军委文艺组审查；我在江西南昌和林雨一道宣传76师支左模范李文忠的英雄事迹，有什么错？到底犯了什么罪？白天没完没了地写检查，夜晚，十几个人的大房间，头顶上100支光电灯泡，昼夜通明，根本无法睡觉。有时，好容易迷迷糊糊入睡，但很快又被噩梦惊醒，常常睁着眼睛盼天亮。我的神经受到很大刺激，严重失眠，比我在军事监狱坐牢的日子还难熬。王群生和我“相邻而居”，将近一个月，我们之间没有说过一句话（因为怕串供），只是经常互递同情的目光。有时半夜里，我也常常能听到他无奈的叹息。

如此，精神上的折磨的日子，不知过了多久。忽然发现钟峰不见了。有一天，我忍不住询问诚子：“怎么好几天没有看见钟峰了？”“你问他干什么？”诚子回了一句。突然又说：“他正在交代自己的问题，与你无关。”（后来知道，他们内部有人揭发他与省军区造反派参谋长庄中一有联系。）

没有过多久，清查“5·16”学习班，竟然悄没声地结束了。

与开始不同的是，我与王群生可以共同骑着自行车回家了。在路上，我问到在江西时候，不是文副政委的王秘书打电话，要林雨来的吗？王群生说：“不是。是我以你的名义打了电话。因为林雨不认识我，但你们是朋友。”

“哎呀，原来如此。老弟，你可把我害苦了！”

虽然学习班名义上结束了，但是“迫害”并未终止。一系列政治运动仍在进行，“清理阶级队伍”、“整党”以后，歌舞团宣布解散，绝大部分文艺骨干复员到地方。我和王群生、穆彬予三人被一道命令，开除军籍，复员处理。

据说，在军区党委高层研究处理时，政委袁升平曾发话说：“我看，依照南京许世友司令员的作法，让他们一律下放农村。”杨得志司令员不同意。他说：“不能这样处理。”

这个歌舞团当初是我向罗（瑞卿）总长要来的。现在解散了，应该按照政策，让他们各自回到参军的城市。”

于是，王群生回了重庆。穆彬予回到北京，但她通过高层关系，调到解放军艺术学院任舞蹈教员。我回到上海，分配在上海交流仪器厂当工人，因为没有技术，厂领导分配我到金工车间看牛头刨床。我妻子受我牵连，也从山东政府机关干部变成工人，和我在同一个工厂，在装配车间当绕线工。我们每月工资 41 元，比当时的学徒工 38 元多 3 元。

直到 1975 年，邓小平第一次复出，主持领导工作，中央军委与国务院联合发出的 104 号红头文件，将文化大革命期间被错误处理的部队营以上干部一律收回部队，重新处理。于是我和文化部的徐翔南，从上海工厂回到济南军区，又重新恢复军籍，穿上军装，拍照留念，装入档案。

在政治部领导征求我们分配工作意见时，我们一致表示，依旧愿意返回上海，重新分配工作。就这样，我从上海交流仪器厂的车工，变成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编剧。工作变了，身份变了，环境未变，噩梦依旧。亿万人遭殃的文化大革命仍在进行。■

【述 往】

生命中的血红碎片

胡仄佳¹

武斗

文革到来那年，对我这种瞎读所有到手的乱七八糟书，还迷糊做白日梦的小孩来说，革命红咚铿锵的热闹喜气撩人，那背后越来越浓的煞气是体会不知的。

¹ 川人出国二十余年，目前定居澳洲新西兰。四川美院油画专业毕业，曾做过绘图工、摄影记者美编等职。九七年开始写作并发表作品，在澳洲、新西兰、台湾、香港、美国、中国等国家地方的华文刊物报纸发表数百万文字，摄影作品也颇有心得，摄影作品为《香港文学》封面共十一期。已出版个人散文集三本，散文《梦回黔山》获美国世界日报第一届新世纪华文文学奖首奖，同时获首届成都市金芙蓉文艺奖；散文集《“晕船人的海”》获成都市第六届金芙蓉文学奖；散文集《风筝飞过伦敦城》获台湾华联九一年华闻著述奖；散文《故乡的记忆》获第二届国际新移民作家笔会 2006 年成都记忆征文一等奖等多项奖项。

繁华百年的商业街春熙路与我们的街并列紧邻，满街商店和不高柳树非常迷人。

几乎是一夜间，整个春熙路被篾竹钉成的高近三米的大字报棚墙变貌，街沿两边的柳树们被大字报棚双面夹裹只哆嗦伸出树枝头，商店门还开着，店名街名。棚上大字报日日刷新，糰糊味新鲜，各革命派别的人从自己的军用挎包里掏出传单抛洒，如雪花骤降引起革命群众哄抢，那节奏躁动，满街都是要革命的红卫兵。

我们街男女老少的居民生活节奏要慢好几拍，每到晚上还照样般出自家的小竹椅板凳到街边乘凉，坐定了再七嘴八舌热烈口头传说道听途说的革命。其实早被革命过的成都人已经没有了私人房地产，一个小院子几十户人家挤住，没有私家厨房洗手间私家空地，每到闷热夏季晚上，所有邻居都涌到大街路边上，苦等风褪人凉，不这么折腾几小时晚上是睡不着觉的。

我和我哥哥一帮小孩哪里肯在小板凳上扎根，趁大人不注意就往总府街大礼堂门口人多地方去，挤进过去扯场子演坝坝戏般的围成一圈一堆的人群中，看那一个两个激昂人在中间演说，表白对毛主席的忠诚热爱，抨击走资派保守派的罪恶。小娃娃的我们，钻进人群里就图个东看西看的热闹劲。羡慕那时男女身着时髦的洗得浅黄近白的旧军装，拦腰扎起军用旧皮带的精神模样。

记得人激昂讲演中突然有人插话问：

你是啥子成份？

讲演者老实，居然气短低声说自己的地富反坏之类家庭背景，革命群众嗷一声起哄，刚才还口若悬河的讲演人眨眼消失在人缝里。这才似懂非懂晓得那种场合是根红苗正者地盘。

我大哥不晓得从哪里弄回一铁桶不知作用的绛红粉提回我们小院来，加水稀释了就指挥我们这帮小孩要把院墙刷成“红海洋”。那时流行全国山河一片红，具体做法就是把所有的墙面变赤，成红海洋。父母成年人看看我们抡起扫把对墙涂抹，到下午临街的这堵墙

果然变赤。不过这红粉颜色不正又无胶质粘着，刷过的墙面害人，路人更多的是我们自己，只要不小心靠了这堵墙，绛红乱了衣裤，难看，还很不容易洗干净。

红海洋后的此起彼伏的武斗不知不觉替代了成都人善辩的嘴巴仗，真刀真枪起来你死我活得真切，诡异的是武斗双方都自命是毛主席的铁杆红卫兵，杀戒大开。一圈圈的辩论场子在街上消失，总府街春熙路被另一种热闹改变。

邻居们依然衣冠不整的夜夜乘凉，但随时准备提起椅子奔逃命，只要听见啥地方爆竹似的枪声一响，满街沿懒散乘凉的人呼啦啦弄出的响动夹着大呼小叫，几分钟后，整条街干净得象洪水冲刷过，猫狗小孩都没声了。长则个把小时，短则十几分钟，枪声不再，各院各家门后探出头截脑袋半边身子左右张望，胆大的人提着板凳椅子又坐回老地方去。

条件反射的跑多了疲惫，随之生出满不在乎感觉来。那几年武斗激烈死人多，今天这派开车载尸游行：“未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高音喇叭男女声铿锵，悲切音乐中“烈士”尸体血呼呼的吓人。等几天风向转了反对派胜，前头对立面的“烈士”就成了“该死”。犹记得父母友人弟弟在重庆参加武斗被打死，听父母感叹不敢信，那大哥哥来过我家，方头大脸满脑壳卷发，熊腰虎背蛮壮笑起来却很阳光的二十出头，人一下子就没了？

到了哪一天晚上听不到枪声或街上人声海啸反而睡不好觉时，老成都安详世俗舒缓的生活节奏不复存在。不是白天黑夜白天游行敲锣打鼓庆祝领袖最新指示发表，就是被大喇叭缓慢非要人哭的哀乐唤出屋来，武斗严重死伤者众时，成都街头很难形容是萧煞还是热闹？

还记得某个夏日晚上一群身份不明的男人从我们的街上呼啸而过，他们中间那个披头散发沉默不语的女人，和那半身裸露手持皮带抽打她的年轻男人格外引人注目。没有任何人敢上去问一声为啥？记忆是黑白两色的，二三十年代早期电影一般，有画面声音脱节变形的癫狂。

邻居中有位在街道工厂上班的大娘，文革给了她起来造反站直腰板的机会，她参加的是成都工人造反兵团。大娘对兵团司令宋立本佩服万分，晚上乘凉听她说宋司令神奇命大故事。绘声绘色说宋司令某天躺坐在椅子上抽烟，就是把椅背斜靠墙子前腿翘起悬空，成角度的人躺坐法。烟抽完宋司令身子往前一弯头一低，椅子回到四脚着地正常状态。就在那瞬间，对面楼里打来一枪，子弹洞出原来他头靠墙的位置。你们说神不神？要不是他突然坐正，那一火（一枪）肯定打死球啰！

大娘神说宋立本没过多久，就听说宋立本被对立造反派活捉，残酷折磨一番后，死得很惨，据说是被点天灯灭掉的。

四川武斗之烈，到末了，除了飞机外，坦克大炮都搬出来对阵，四川有那么多军工厂不缺枪炮。武斗打打杀杀，四川男女横死于疯狂残酷武斗数目不详。

记忆最深的是发生在成都川绵厂的那场惨烈武斗，因为我大哥居然成了参与者。

他这个小屁孩是怎么跟着保皇派“老产”们进入那幢大楼被堵住冲杀不出来的？大哥至今也没说出个子城寅卯来。但模糊记得他从武斗现场跑回家来的狼狈样子和简述。他说趴在大楼左边窗的人被一枪打中死了，人从窗右边探头去看也中弹倒下。楼门被对手封死了，最后有人发现有根粗大的工业钢筋靠在楼拐角窗边，那人抓住钢筋溜下地奔脱，我大哥也如法炮制，滑溜下地躲逃过了莫名其妙的必死命。

我大哥从小就文绉绉的非野孩子，但荷尔蒙驱使下很干过几次胆大且命大的荒唐事来。文革开始那年，他十四岁。

学校

工人农民不上班种地的年头是闹革命的年头，红色领袖号召造反有理，于是天下大乱。

乱中的小学中学却没散伙，成百上千的半截子么伯儿青勾子娃娃们倒大不小的，没学校监管不行。不过，学生到校上课学什么降到最次，谁在课堂上当教师才是要紧的。

成都三中的“工宣队”师傅们来自那个工厂记不得了，奇怪的是学校年级变成了军队建制称作班排连，连队政治指导员是四五十岁的工宣队员，黑脸，工装裤吊档，松垮垮的瘦高。教政治课还吼吼带领学生出操，整队集合，向左看齐！一二一喊得声声严厉。城市娃娃学生还没来得及好好当，哪里会当小兵？集体多转几次身，就要冒几个分不清左右的糊涂虫出来，马脸工宣队连政治指导员张嘴就一通臭骂。

教数学课的工宣队师傅二十来岁，聪明模样但有点流气的人还真懂点数学，那堂数学课教“正比”，他满脸得色解释啥叫正比：“正比嘛，啥子叫正比？吃得多屙得多就是正比！”恶俗比喻，听得班上最会骂怪话的几个街娃男学生都面面相觑。这课真是上不下去了。

可学校还有外语课，教的是俄语。工宣队军宣队挑不出人来教此语种，就依然让学校女教师上课，课本内容不外乎“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我是工人，我是农民，我是学生”之类口号，照说学习童子功应该记得上述老毛子词语一辈子，不料记得唯一单词只是“哈拉索”。成都方言无卷舌音，那俄语的弹舌音难度高，几堂课下来满教室乱弹声唾沫横飞，会者寥寥。

女同学鬼头鬼脑传说俄语女教师正在跟她丈夫闹离婚，偷听她在学校办公室跟同是教师的丈夫压低声音声吵架的女同学说，吵到最后我们的俄语女教师冷冷一句：看谁笑到最后？女同学傻乎乎不懂，这话啥意思呢？

学生们去成都三砖厂去和泥去搬泥砖，美其名曰学工。把那那一大坨搅拌好的黄泥搬起来使劲砸进木框，刮板刮平多余泥，小心去掉边框，托住底板将砖胚层层叠放等待风干。同学再傻也明白，我们不过是免费劳动力罢。但谁都不敢说闲话，学啥工喔？连工人的面都没见到过。

学工一月住在砖厂，周末才准回家。废弃砖窑车间平台上是女生通铺，晚上一声惊叫，半截墙上有白手在晃！哭声四起，领队的女教师气鼓鼓打开电筒一照，哪里是人手嘛，墙头上一截被风撕烂的旧报纸被风吹得飘起又落下。

记不清去的是成都郊区那个公社“学农”，帮村子里婆婆大娘铡猪草，还被摆拍了张两寸照片。铡猪草学到了些什么农业知识？至今无解。

倒是在学校里跟“军宣队”混的日子比较好玩。那白白净净的小班长领着几个比他还年轻的士兵给大家做军训准备动员，河南小兵愣头愣脑上讲台，吧啦吧啦一通说，最后连说几声“中不中”？成都娃儿没听过河南话，全班傻相。小兵被满教室傻脸急坏了，河南小兵满脸通红急得喊也没用。

军宣队班长工宣队连长加一帮政治可靠的教师，就领着全部学生去龙泉山军训了。每个人背上自己的大铺盖卷，步行走去那山。山上有成都第二师范学校建好但还空置的校舍可用，三四个学生一间房住下有遮风避雨地还不错，另有炊事员一同上山，学生有集体伙食团解决了吃饭问题。没料到的是春寒季节里的山上仅有蒜苔这种蔬菜，虽然偶尔腊肉蒜苔荤炒香，但蒜苔在肠胃里周游一遍后其味臭不可闻，军训每天早集合的训话，总被此起彼落臭屁打断。

整队集合就是军训，白天全校学生在楼舍间不大的平地上操练走正步已累得半死，苦的是楼里还没铺设水管，每天要去远处水房端回一脸盆水来做洗脸洗脚用。某晚突然紧急集合哨响，错觉军训结束要回成都的幸福感冲上学生头，人都把脸盆里珍贵的水豪爽泼掉，脸盆铺盖捆做一包，兴冲冲背起来在暗夜山野里跌跌撞撞夜行军。结果是走了大半夜，最后走回的还是山上校舍。那姓苏的小班长并不理会几个早熟女同学投给他的暧昧爱慕眼神，看见男女学生集体敢怒不敢言的表情，让这帮城市小孩狼狈夜奔，他才乐不可支。

学校越来越乱，按军队连排建制的学生中里总有几个坏孩子，统称为小流氓。记得有几个男女小孩的做派是有点另类，他们平时不跟班级里还傻乎乎的毛孩子玩耍。但他们是怎样被学校工宣队发现抓住的，无人知道。但这几个男女被抓被审了好些天的消息风传全校，说工宣队师傅审得认真，特别是审小女流氓问得非常仔细。班上那个小女流氓交代，说都被男流氓摸遍了的坏法。奇怪的是工宣队还是放过这几个小流氓，过些日子，几个人又悄悄回到班里混时间上课来。

三千初中生的学校，还有过一次现场逮捕反革命的集体大会。

罪人是似乎是在毛宝像上画了圈圈叉叉被人发现，高台上讲话人宣布了罪人罪状，震天口号中被当场扣上手铐押走一男孩也不清楚是哪个班级的人。

在红旗横标和拳头森林空隙中远远看去，台上那罪人不过十二三岁，五官面目不清的小孩不哭不闹，活像个一身黑裳苍白脸的玩偶。

猛追湾游泳池

年幼时并不知猛追湾名的来历，不知明末清初时张献忠杀尽四川人后最终被清军追赶，匪人逃至这一带府河边黑松林失去踪影的往事，杀人狂张献忠被清军猛追过的河湾因此得此怪名。对我来说，猛追湾游泳池是打打杀杀文革中成都的不多安静去处。

那时的猛追湾游泳池更像座大公园但大门开放，门里一边是建造得深直的人工河，两岸法国梧桐垂柳夹道，是成都闷夏优美清凉的地方。

沿人工河过桥去到河那边的花园树林绿地，要再走一段才是游泳池区域，有跳水池、甲池、乙池、丙池（少年池）、儿童戏水池几个不同泳池，游泳者要买门票才能去游泳。跳水池甲池费一角，乙池七分丙池五分，戏水池也要三分钱的一小时一场的价格，全民低收入的大众未必付得起，大量买不起票的成都男孩就直接到旁边不远的猛追湾府河母猪沱下河洗澡。从二号桥桥墩上跳水的青勾子娃儿（成都方言，指屁股上胎记仍在的小孩）成群结队，扑通栽下去溅起好大水花，再狗刨游回岸，爬上桥又得意再跳。去自然河里游泳不花钱，但每年总要淹死几个人的。

我们院子里的男女小孩通常是各自跟父母要一角钱，结伙走或骑车去游泳池，走得汗流浹背，夏天一周总要去游一次。

那次已走进猛追湾的绿地，或许是天太热中暑，我们中年岁最大的猫咪突然咚一声倒地口吐白沫抽搐起来，小孩我们没见过全吓呆，不知如何是好？幸好十几秒钟过后她自己醒来，坐在地上满脸茫然不知发生过啥事？

谁提议去茶馆坐一阵，再去游泳好么？坐坐歇口气也好。

诺大半露天的茶馆冷清，唯有一桌男女围桌在打牌，玩四川长牌。

茶馆木架上有粗大紫藤遮荫，我们找处荫凉散座，看人玩牌。那桌牌客个个手指焦黄脸也黄，我看不懂长牌规则，不懂他们几把牌是如何打完的，只听见一黄面年轻男说输惨了，朝身边女人努努嘴说那就把她输给你。对面半老男赢家拉过女人前先扫我们这群呆木鸡小屁孩们一眼，那女人已痴笑一屁股坐到他大腿上。也不晓得他们是开玩笑还是来真的？

坐一阵热褪了，就走去游泳，我们游乙池。

更衣室是游泳池看台下成角度的空间，男女各据一边，各有把门人收票才让人进去游泳池。女更衣室里空荡荡就我和猫咪两人，脱下上衣第六感管灵背上微痒，回头一看，三米高的小窗上居然有小平头和两只贼眼在朝我们看，我们尖叫，空旷更衣室放大那声音，窗边人头嗖的下沉，高墙外一声闷响，慌乱脚步声远去。猫咪恨恨说，狗日的，绊（摔的四川方言）死了才好！

小学同学孔祥明的老爸孔繁章坐在游泳池边竹椅上做看守员，每次在游泳池见到孔先生就点点头问好，我去过他家多次，他晓得我和他女儿是小学同学，还大概听说我妈她们如今在图书馆里上班。成都棋苑和市群众艺术馆是近邻，围棋教练看游泳池，艺术馆的男女去市图书馆上班在当时正常，啥缘故？我懵懂半知也没觉得有何不妥。

有天孔先生小声问我：能不能喊你妈妈帮我借几本笔记小说？

回家把原话复制给我妈，再把我妈的答复记在脑袋里，隔几天再见到孔老我留声机般复述：

我妈说不晓得啥子叫笔记小说，她说哪里有笔记小说喔？

孔先生连声用否定句式说是是是，是莫得啥子笔记小说。旁边没有闲人，就我们对话。

复述完我跳进乙池哗啦啦游几圈，游累了趴到游泳池边歇口气。游泳池里人少不过小猫两三只，远远望见孔先生坐在竹椅上读报，池水漂白粉味道浓重，池墙和孔先生衣裳好像都被熏出一色灰白。

过些日子去市图书馆书馆玩，悄悄从书库里偷出些“镜花缘”一类书乱看，看过后也没问我妈，她是真不知道笔记小说还是胆小害怕装傻？

那时的猛追湾游泳池边还保留好长好厚一段不知是明还是清的老城墙，厚重高泥墙上有穷人家的歪歪扭扭简陋竹木住房，班上一男孩家就是其中之一。老墙那边是军区后勤部占据的看不见的好大地盘，每天正午和下午某个固定时段就有军号声破空而来，伴着从早到晚不断的夏蝉嘶鸣。

凉粉

川菜平民化美食中，凉粉最有名，白凉粉黄凉粉味极好价格又便宜，成都人个个都爱。

成都凉粉店通常小且简陋，小小一间，专卖。脏兮兮的玻璃橱窗里，结晶倒扣在桌上的凉粉晶莹还保持着大盆的原形，那有孔眼的圆形铁皮被店员顺势在凉粉冻上旋出长长好看粉条，被快手抓抛进桌上排放的小空碗，手很准，每碗份量不多不少。店员从桌上十来盆调料大碗里挑出内容遍布凉粉碗里，那半透明的凉粉热情到无人能抵挡。买得起五分钱一碗红油凉粉的成都人，味蕾开放心满意足，凉粉店生意好得很。不过口袋里没一分钱的人也很多，如我的馋嘴小孩，在凉粉小店外怎么看也是白看，最终只好唾液满嘴灰溜溜走开。

文革伊始，“老运动员”我爸被省歌舞造反派关进牛棚时间长达一年半，不准回家，工资一分钱不发，全家老小就靠我妈的工资过活，即使连原本最平民化的成都美食也离我们家远去，能吃饱就不错了。

但到底是孩子总是馋，我们几个小孩记不得是谁是从自家厨房翻出半瓶绿豆粉来的，还是几个人合伙凑钱去买回半斤绿豆粉，总之，绿豆粉是可以做凉粉的。有粉就动手，拈开蜂窝煤炉眼眶（活像微型平菇的蜂窝煤眼盖子，盖上煤眼后煤炉火势休眠）让火苏醒，将绿豆粉倒进大铝锅，胡乱倒进大半锅凉水，抡起锅铲开始搅熬凉粉。

肯定是不知准确比例的炮制，可运气不错，清汤渐渐发白果真渐稠起来，到雾蒙蒙开始冒热气泡，七嘴八舌中赶紧端开锅把粘稠汤倒进小盆，然后急不可耐静等凉粉汤慢慢冷却。想不起来那天吃得开心的场面，而且调料简单，一点菜油一点酱油醋和一小勺白糖，撒点花椒面浇上红油辣椒，葱花生姜末的自制凉粉不比店里卖的差。

那次瞒着大人偷偷做过凉粉后再没机会试手艺，家里绿豆粉被用完肯定会被发现，被一顿臭骂就是最温柔的结果。小孩子我们没有多少挣钱的办法，最多就是盼着家里的牙膏挤完把牙膏皮攒着，把吃过桔子橘皮晒干存起来，再不就是收检旧报纸，就这些小打小闹的东东，废品收购站也收买但最多几分钱，绿豆粉也不是随便买得起的。

好在孩子们饿归饿，该疯玩的时候照玩不误，骑自行车，跳房，几个孩子扳起一条腿，单脚跳跳用膝盖头互相冲撞“斗鸡”，玩得照样开心，男女小孩不就这么混大的么。

文革深入，革命的范围越来越宽，原来每天进城来卖四季新鲜蔬菜，鸭子，鸡，蛋，泥鳅，活鱼和各色鲜花，推鸡公车、骑自行车、挑着背着在城里做小买卖的郊区农民失踪了，成都百姓不用走几步路就能买到日常生活食材的舒缓日子被红色文革无情斩断，走到有千年传统美食基因的成都人，活到吃啥都要凭票地步时，肉票，面票，酒票，几十上百种的号票每月都需要计划用，甚至连盐都要凭票买之际，成都人那敢公开发贬言，只敢在家里悄悄叹气：还有啥好吃的喔？吃个铲铲！（成都话读成吃个铲传！）

国营食品商店里的凉粉不要票，还可以随便买，反正买的人不会多。

再后，发现成都红色纷乱的街头上出现很多背大竹背兜的，衣衫褴褛，口音异样的男女农民在城里大街小巷买一背兜一背的凉粉，匆匆来又沉重去的场景时很诧异。成都市民

食材中最便宜的东西凉粉名列前茅，熬过凉粉的我晓得此物成分中至少百分之八十不过是水，这些外地农民买那么多不经饿的东西干什么？

听得懂乡音的人问过那些背篋农民，谈气说农村没得吃了，能跑出来的农民拖家带口出来城市逃荒要饭，讨几个钱时就买一大背兜凉粉，全家老老少少那几天就暂时不饿。

那些满街背兜买凉粉的农民们来自广安，是邓小平老家的农人。

红色歌舞

父母和他们的朋友多是文学艺术圈中人，从小跟这帮文人艺术家混，说话接触的基本上都是这个圈里人。因为这样的环境，看舞台表演对我来说是件再自然不过的日常事，虽然我天生表演欲淡，看他人表演的兴趣却极大。

记得台旁台下看四川省歌舞团美女舞蹈“康巴的春天”，听范裕伦唱川江号子，看锦江剧场里“秋江”中陈书舫俊美优雅扮相，周启何白鼻子的滑稽，还看过不少工人农民的业余话剧芭蕾唱歌演出，各种不同类型的表演皆为我兴趣所在，如同小时乱读书。

文革红色风暴一到，把所有上述“封资修”表演统统打翻禁演，只让红卫兵宣传队革命歌舞占领所有舞台包括街头，身穿军装围圈挥拳喊打喊杀的歌舞形式粗糙原始，却对我毫无观赏转换障碍。束扎在褪色军装里的青春杀气歌舞，唱着“我叫刘少奇，真是个好东西”阴阳怪气化妆表演者被男女红卫兵打倒缩成一团，成千上万人在街上在广场上跳“大海航行靠舵手”的集体舞，与我从小小时见的各类表演截然相反，我照样看得兴致勃勃不说，就像四川老话所说：十处打锣九处一定有我。

我家就在成都春熙路旁，看街头或舞台演出方便之极。

被文革搞得六神无主的我妈显然不懂我这种兴趣从何而来，她幽幽问过一次：

“你咋个（四川方言，什么的意思）啥子烂歌舞都要看喔？”

红卫兵宣传队的演出水平，我父母决不恭维但哪敢明说，更何况我爸“历史反革命”的身份帽子沉重，被揪出来再打倒是早迟事，我妈无更多心思在我们兄妹三人身上。我又太小完全不懂父母的笼中困境心情，看红色演出不过是一种玩法，蜕皮变化的不安份少年阶段爱看红色歌舞表演，远比比大哥乱跑莽撞混进武斗现场要安全得多。

成都红色歌舞旋流中心地带，就在总府街、春熙路、劳动人民文化宫这一带。

市歌舞团就在红旗剧场后面，经常跨过马路混进去看演出，当时市歌舞团里父母的朋友都成了牛鬼蛇神低人一等，我要无票进去看演出就不能找他们，要找管舞台灯光的熊眼镜熊叔叔了。熊叔叔家就在剧场侧院小屋里，去时要是正碰到他们全家吃晚饭，也不晓得客气的就跟着吃一碗。然后等观众落座灯灭，看准后排空位子坐上去，更多时候是爬上灯光楼坐在小梯上从头看到尾。从那个角度看演出看到的演员浓妆并不好看，大红大黑勾出的眉眼吓人。

那段时间天天演红色歌舞剧“井冈山的道路”，看过几次后，那旋律歌词现在张口即出。当年主角之一男高音吴国松很年轻，瘦削，前几年偶然从网上发现他在北京发展很顺的新闻，就记起当年“井冈山的道路”舞台上他高歌时有点特别的站姿，裤管微微抖嗦的紧张模样。

最搞笑的在锦江剧场看海京剧团来演出“智取威虎山”，我是怎么混进去的记不清了，但记得远远看去，童自荣果真长着张宣传海报上的团团脸。到幕间休息时，突然听见人说锦江剧场走廊边的厕所被挤得水泄不通了。原来舞台上英雄杨子荣下台依然是凡人一枚，要去洗手间放松通泰一下，谁料竟被大群追星老少男人拥追进那狼狈地方，盛况空前到厕所，我想在那情景下谁尿得出来应该算得上是奇迹罢。

回想当年见过的各类红色歌舞表演阵仗，前两年回国时见婆婆大娘老男们跳广场舞就一点不觉惊奇了，当年的红卫兵们坚持跳忠字舞跳到今天，理所当然就该是广场舞的样子。

蔡嬢嬢和我妈

我妈是因为声带长了小结后不能再继续她的独唱生涯，才从省歌舞团辗转调到成都艺术馆改行做话剧辅导工作，从小不记得她在我面前唱过歌。但盆地成都的空气污染从来严重，冬天煤气浓厚不散空气变糟时，我妈病嗓就忍不住剧烈咳嗽，听得出她的咳有金属脆般脆声。无奈夜晚会把她的咳声放大了好多倍，那时的我妈眼神内疚压抑，实景捂嘴想要咳得小声一点。

同院邻居中有好几个人都有类似呼吸道毛病，在房间不隔音的环境，谁也不会听出意外之音的。不巧的是，邻居中有位女士神经不太正常，各种咳嗽声在她耳朵里变成了争对她的“宣战”或示威。不论何时何处咳声起，只要她在家，总是跳将起来推开她在楼上的窗户，大声假咳，音声色俱厉向“敌人”对咳回去。

这位身材高大结实的女邻居，以其“咳”做刀枪还以颜色是小菜一碟。蔡嬢嬢曾有次不知什么小事得罪了她，她竟然上门去，一拳把玻璃窗砸破弄得自己手上血，就说是蔡嬢嬢打了她。满院子文绉绉的男女都怕她的不讲理。一旦她以咳拉开战幕，小院子里无人敢应战。文革中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妈嗓子再痒，晚上要咳也只好以被子捂嘴拼命压制，忍气吞声咳得很是可怜。

不过滑稽荒诞时刻也会出现。有天晚上我妈实再忍不住大咳起来，只听得楼上窗户气势汹汹被推开，啪的一声巨响，我妈嗓子里后半截的咳声陡然被吓了回去。谁料她大喝我妈名字道：“你可以大声地咳！不怕，我晓得你的嗓子有病！”

全院子鸦雀无声，我妈傻了不知所措，院子里公用水管的漏水滴答声清晰。文人堆邻居中仅有两位属工人身份，她还又加入了工人造反兵团，只有她能这么霸道说话。

这是群众艺术馆家属宿舍，两层砖楼木地板的建筑临街，楼下住三家楼上住四家，院内无厕所水龙头公用，楼下人家还有小小的厨房可用，楼上人家烧菜做饭就只有在窄窄的

过道上，七户人家拥挤居住环境，人之间关系无可奈何的密切，真是不拆墙也是一家的院子里，我妈不仅自动噤声，其他人也都非常小心的不想得罪人，事实是，得罪不起任何人。

文革中还是有邻居不具名写大字报，说某天亲眼见邻居某某走过我家小厨房时，把一纸包放到我家厨房半截墙上，还说半截墙厨房里的我妈迅速收起了纸包，但两人全无语言交接。大字报揭发者文字铿锵要我妈交待：交接的是什么反动见不得人的东西？

同院老少都晓得我爸的历史反革命份子背景，历史反革命份子的老婆无声交接纸包，必然是见不得人的甚至反动物品，逻辑推理就是如此。我妈最后是如何交待过关的我不知道。一个在红色文革中咳嗽都不敢高声，说话还爱脸红，丈夫有历史问题人的女人早就夹着尾巴做人胆小如鼠，监视视线现在来自何方，想想真吓人。

好在蔡嬢嬢跟我妈很好，市艺术馆话剧组就她们两人，无论是到工厂农村去辅导业余话剧表演，还是下乡参加“双抢”支农，这两个女人总是结伴行。俩人闲时嘀嘀咕咕说些女人关心事，偶尔上班时间偷跑去逛逛商店也不会互相告发。她们俩性格皆温和，属那种花五分钱买只锅盔夹凉粉，就能吃得心满意足的开心单纯人种。

蔡嬢嬢是单身母亲非常有童心，虽然她最小的女儿也比我们这帮小孩要大好几岁。

极有童心的蔡嬢嬢不像别的成年人那么严肃，在她的屋子里，我们小孩子可以胡说八道疯玩，她跟着乱笑绝不会板起面孔教训人，还比我妈更胆大更有幽默感。好多次我们跑到她房间里玩，她赶紧把门关严打开收音机，悄悄调到“同志加兄弟”的越南广播频道上，我们一起贴耳听那听不懂的咿咿呀呀“南音”外语，边听边按四川话“音译”出一连串疯人般的胡言乱语。听得哈哈大笑的蔡嬢嬢，是我们小院紧邻记忆中最可亲的面容。我们偷听外语广播的好玩好笑场景，在那特定时空背景中凝固下来，成为我记忆中一张褪色但神情最为生动的老照片。

千分尺枪和厕所

北新街地理位置绝佳，街头对着的是满街法国梧桐树的总府街上的总府大礼堂，左面平行的是有大大小小商店和满街垂柳的成都繁华商业中心春熙路，这两条街附近的电影院剧院和各种商场商店。两条美街把我们街对此丑了，我们街上有民航局售票大楼和省银行大楼，但整条街光溜溜的无树，路两边还挤满的是形形色色大院和单户民居。

右隔壁那院子是供电局工人宿舍，乱糟糟挤住了十多家工人，家家都有好几个孩子。其中一家成年儿子有腿疾，不知什么运头来了竟然得到街道生产组当工人的机遇，混乱年月里健康人都找不到工作的好事到他脑壳上。这位我们喊跛跛哥（川音读成：拜拜儿锅）高兴得走路更是偏偏倒倒了。高兴到半夜，他上他们院子里的公厕，居然兴冲冲把厕所门撞垮了弄出一声巨响来。第二天消息传遍左邻右舍，大家笑死，真是“运气来了门板都挡不住”的嘛。

供电局大院旁是物资局大院，那院子以前当是大户人家的私宅，房子虽老明显气派得多，物资局的局长副局长都住在里面。局长有两个十来岁儿子长张白胖大脸，带领他们院子里一帮小孩玩时就有呼风唤雨的霸气。这个院子的小孩们平时绝不跟隔壁供电局工人小孩打交道。

我们七户人家住的是一幢简单扁平两层楼房，每一间或一间半房间就塞进一家人的小楼，几乎就没空地，称做院子很冤枉。奇怪的是，与我们楼房面积同样宽度，但比我们院子整体面积起码深长三倍的后面院里却只住着一家人。我们楼的左侧是他们的院门，黑色铺板门总关着，人进去要走一段不短的高墙夹道，才是他们院子的正门。院子格调传统，是过去有钱人家的天井堂屋厢房几进几出的独户院。跟着成年人进过这家院子一次，是因为他们的水电费奇怪的归在我们院名下。这家人不跟任何邻居来往，偶尔会有吉普车轿车停在他们门口，街坊传说这家人有公安特别背景，很神秘的低调。

这个院子最难得的是竟有厕所，一家人自己的厕所呵，厕所位置就在我们院子的公共水龙头墙后面，我们院子住这么多人却没人类必需的出口地。

我们街上的几个机关院子多少有间公用厕所，连这个有特殊背景的私家院子也有很是不讲理。要知道我们虽然也住在院子里，却跟街上其他几十户散户人家一样，家家门后得藏只不得人的臭马桶，要等到每天傍晚收粪车一路喊过来，各家就忙不迭端出私家马桶放到门前大路边，等收粪人骂骂咧咧倾倒。倒空的马桶脏臭不堪，每家人都得自取水来当街洗涮才能拿回家继续使用。每天傍晚我们街上的恶臭要好久才散。

倾倒臭马桶就是我们各家的孩子职责，家里孩子多的就轮流值班，谁也逃不脱这让人厌恶难堪的事。

武斗期间，我大哥他们几个男孩不知从哪里弄回一根用工厂千分尺改造成的“枪”带回院子来，把子弹塞进这管奇特的枪膛里去，再使劲拉千分尺屁股上带弹簧的帽子般“枪栓”，手一松，弹弓劲道下击发点强力，噗的一声，子弹真就能射飞出去。

那天，我们一群小孩围看我哥他们怎么玩这杆“枪”，几个男孩七手八脚弄好子弹，端枪说往哪里打？院子太小，唯一空间就是公共水龙头处。我哥他们就把千分尺枪朝着水泥平台下的墙壁，枪管微微向下猛拉一把。

枪响声那么大，吓坏大家，那湿漉漉的脏墙被打出个深洞来。

突然有谁惊呼，墙那边是隔壁院子的厕所呵！

一看，弹孔位置似乎与人的蹲位高矮相当？刚才还天不怕地不怕的孩子顿时惊吓鸟兽散，过一阵，没听隔壁有人呼救或咒骂，吓得不轻的半截子幺伯儿（川话指半大小孩）的我们才悄悄放下心来。

那杆千分尺枪的最后下落不清楚，很可能是被我哥他们几个男孩悄悄扔掉了？

我爸和他形形色色的朋友们

从牛棚重新放出来的我爸成为家里常住人口时，感觉很异样。

我爸大半辈子都在四川省歌舞团做快手词剧作家，无政治运动时，他写歌词写剧本或随团去外地外省演出，还经常去省内少数民族聚居区采风收集民歌资料，数月半年不在家是常事。再加上隔半年一年的各种政治运动风浪起时，省歌舞团第一个拉出来批判写交代材料的就是他。我爸年轻时是南京国立剧专穷学生，不知通过什么关系弄了个国民党少校译电员位职挣学费钱，靠此他才能完成学业。1949年后能在省歌舞团工作是幸运，是需要他这样的写手，要不他所有的国军文职军衔足以把他送进共产党大牢甚至掉脑袋的。可怜的他档案袋里的“历史反革命分子”身份注定了他后半生只能活得艰难。政治老运动员是省歌舞团现成的活靶子死老虎，不管什么运动来，拉他出来批斗最方便不过。

历届政治运动老运动在文革中被关押的时间最长，放他出牛棚恩准他回家来已是大恩典。但成为家里常驻人口的我爸明显不适应，他开始在我家小厨房里乱炖做菜煮饭，时间还是太多，就用他当牛鬼蛇神时在牛棚里学会的半吊子木工手艺，东拼西凑找来些木板边角材料，锯刨成几张小板凳，两只小灯柜和茶几。又买了把金刚钻玻璃刀豁玻璃用，先为我们家将豁好粘出只长方形玻璃鱼缸，邻居们看了心动，我爸就为家家做了鱼缸送上门去，一时间家家孩子都要去阳沟小河边捞鱼虫养金鱼，我们小孩子的时间过得很快，却不懂我爸的时间慢得难熬。

我爸的朋友很多，文革前各路朋友有事没事经过我家门，总要进来坐坐喝茶吃饭聊天，家在市中心的我们，从小习惯了家里有走马灯般的访客情景。

从牛棚回家来的我爸扣发工资一年半有多，后来发点生活费，靠我妈的工资养活全家六口人，日子紧巴巴过得很难。更惨的是文革中所有物资都由号证统一分配，每月全家的酒票烟票加起来也不够嗜烟酒的我爸一个人用，可他的朋友来了烟酒却是要与客共享的习惯不变。记得我爸做了一个简易木卷烟器，所有烟屁股都回收，撕开烟纸收集烟丝再卷再抽一次。茶叶一卖就是论斤。

我爸还馋酒，实在没酒喝时买醪糟来过酒瘾。印象最深也最滑稽的一次，是某天客人在饭桌上说话激动乱挥手，小半瓶白酒泼翻于桌，酒汇成了溪流，我爸他们几个男人居然

都把嘴凑到桌上猛吸酒。看得我惊笑，斯文扫地的我爸他们，不顾脸面的那场面神情真是难以想象。

最很喜欢成都军区后勤部军官杜叔叔来家里玩。个子不高的杜叔叔是南充人，他来总是会从军用挎包里掏出瓶酒或者一小包熟肉之类东西，圆鼻头微红的杜叔叔爱酒也爱聊天，喝得兴起就说些军中故事，说起文革前那个骗遍成都军区上下高官的女军人，说她拿得出那么多跟大官一起合影得嘛，哪个看了敢不信她没得特殊背景呢？杜叔叔他是怎么成了我爸的好友常客，至今都是迷。

还有红小鬼出身但还是被打成右派的孙静轩也是常客之一，似乎酒量不大喝醉的时候不少。记得有次他酒后要自己走回东风路的家，小孩我陪他走到春熙路口，突然想起问他最喜欢他自己写的哪首诗？孙叔叔不稳地站在路口想一阵，说最喜欢他些的那梦见很多各国美人在海船上向他歌唱的那首。还说不要问我为啥喜欢，我自己都说不清楚，就是喜欢。

那时的孙叔叔剪着极短的小平头，黑发里几根白发刺目。

川剧团的白美琼和她儒雅丈夫陈国祯住得离我们家最近，不是他们来我们这边就是我们去他们家，一点酒菜可以吃喝聊很久的天。白嬢嬢个子瘦小性格分明，朝天椒般厉害还极善讲故事。说起她年轻时生孩子坐满月子起床来，发现旗袍竟短了一截？她哈哈大笑自说还是个孩子还在长身体嘛！相貌堂堂的北京人陈叔叔爱上她，随之定居蜀地几十年，能说一口地道成都话，想来他们的爱情故事一定很有意思，可我太小还有点怕白嬢嬢，不敢乱问。

那时见到她就想起文革开始，川剧院满墙大字报中，用几张全幅白纸拼成的“美女毒蛇白美琼”几个被红墨水打叉的巨幅大字报画面，白嬢嬢性格分明，又那么弱不经风，想不通她咋会是美女蛇？

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喻维梁说话手舞足蹈，经常是在我家做客时说着说着，一步就跳到桌子上，继续说话且肢体语言丰富，我爸妈不见怪地招呼他下来下来，坐到慢慢说。

跟喻张扬天性对应的人是川剧团美工谭昌荣，这个大个子男人沉默到极点，他也爱酒，来了就与我爸两人对坐，慢慢抿那点白干酒，几粒豌豆胡豆下酒不说话也能坐半天。谭叔叔那时是农村户口迁不来大成都，已婚人其实过的依然是单身汉寂寞日子。谭叔叔在白道林纸上画国画，画乌鸡牡丹花，他卷过几张来给我爸妈，要他们用来遮挡糊住光溜溜的玻璃窗。

文革中广为流传的对联贴到我妈工作的市艺术馆大门上，记得是：

庙小菩萨大，池浅王八多。

白纸黑字的岁月通红，此时回望，衬映着我爸落魄文人的身影，在劣质纸烟劣质酒菜和一帮形形色色朋友的伴随下，我爸度过了他的壮年。

大串联

那次少年出游时，我才十一岁。

在毛泽东“我的一张大字报”鼓动下，全中国人的热血沸腾起来的时代，人响应号召起来在各阶层造反。全国性的“大串联”像火一样烧遍中国大地，红卫兵便能煽风点火到处传播“革命种子”。事后才看出有心人趁机理直气壮免费游遍全中国，还有很多热血青年效仿红军当年的万里长征，沿同样路线通走一遍。但那是成年人和青年的“壮举”，像我这么大的孩子很难跑那么远。倒是比我大两岁的大哥，不知从什么地方弄了军装军用皮带穿上，叉腰照了几张典型的红卫兵像后，自觉是成人了，野心勃勃想到北京去串联。那阵子所有北上南下的火车，都免费满载各地红卫兵去串联造反。不论任何组织和个人，只要着一身红卫兵装束，就可以理直气壮的奔向自己想去的地方，有劲挤得上火车，忍得住饥渴和上不了厕所的难处就行。

混乱中，我大哥独自跑到成都火车站，挤上了辆将往北开的火车，又被车上的成人揪着衣领硬赶了下车来，说他太小。气急之下，大哥回家来自己拉大旗成立了“瑞金红卫兵

敢闯战斗队”，同院的七个小孩就是全部人马。成立红卫兵组织无需任何人批准，打出名号扯起大旗就是山头，更何况我们的红卫兵没有任何批斗目标，目的倒很明确就是敢闯要去串联，要自己步行到什么地方走一趟，去哪里好？成都附近的大邑县成了目标。

并非没去过大邑县，市艺术馆组织过好几次集体参观，我们这群孩子都跟着去玩过。可这次我们想自己走去，那种豪情换句话说是天不怕地不怕的顶着红卫兵胆子非去不可。

豪不犹豫的，父母们同意我们去步行，还帮我们做了面大红旗，再塞给各自的孩子一点钱，我们每人都背了个有一两件衣服的小包准备工作完毕。糟糕的是这帮小孩中就我一个女孩，年龄最小但死犟，死活要跟着这帮男孩子步行。再不会看哥哥们脸色的我，也知他们烦我，带上我实在是无奈。

出发那天的清晨，满城晓雾，革命反革命的人还都在睡懒觉，父母们把我们送到院门止步，似乎没担心我们这帮孩子会有安全问题。浮躁得象小公鸡似的我们，恨不能一路喧哗出城。大哥领头高举大旗，在父母面前我们着排队雄赳赳出发了，但还没走出成都老南门大旗已沉重不堪，只好卷起来由我哥他们扛着走。

大邑县离成都市直线距离不过百里远，中间隔着双流新津两县，对我们这群小孩来说，路很远。在当时既没地图也无成年人同行，一帮“青勾子娃娃”就这么出走，在今天想来很不可思议，那是中国现代史上难得的一段奇异短促时光，全国性的武斗，深入中国各阶层的生死混乱争斗还未全面撕开血口。在那短暂时间里，四川内陆的城乡还安定，人心深处的恶还未被全部释放出来。再说中央政府毛泽东号召支持的大串联，令所有城镇乡下都成立了红卫兵接待站，由当地政府提供免费吃住给来往的红卫兵，有饭吃有地方睡觉的方式，恍若回到了人民公社吃大食堂的年代。

成都城外柏油公路上车辆不多，一队队的红卫兵们来来往往，多数身着时髦的旧军衣戴军帽扎着军用皮带，我们戴着自做的红袖章还是平民打扮。看单个或成群结队的红卫兵们在公路上走动忽聚忽散，红袖章红旗黄军装的颜色，点缀在麦苗儿青青菜花儿黄的川西平原上，果然有宣传画上所画的那样有种清新动人的青春质朴美。

川西平原上竹林葱茏那是农家林盘，经过时总有鼻涕长流浑身稀脏的孩子追赶出来，冲我们口齿不清地叫：

“红卫兵叔叔泱泱（嬢嬢的地方方言音），给张传单嘛！”有的孩子还跟我们跑一段路。我们这帮“红卫兵”哪有传单可散发，却骄傲被鼻涕孩子当作大人看，那几步路走出得意自豪感来。现在回想，那些小孩不过四五岁大，没上过学肯定也不识字，他们要传单干啥？农民父母指使自家的小孩出来跟红卫兵要五颜六色的传单，恐怕是用来糊墙点火包东西甚至当成揩屁股纸？出产丰饶的四川农民生活其实清苦，买不起草纸用的农家常见，路上用过的农民厕所顶多有半截竹篾巴墙象征性挡人视线，茅坑里细竹片小石块的作用一目了然。

走，走走走走走，从早到晚不停地走，头一天还新鲜感十足，走得精精神神的。第二天就开始有人掉队了，掉队的居然还不是我而是大熊。在我哥他们带领下大家不管不顾继续往前走，根本没考虑丢下他怎么办？直到几个说北方话的大红卫兵快步超过我们时，顺便捎来信息：

“你们是不是有小伙伴掉队啦？他坐“专车”赶上来了！”回头一看，大熊被拉粪的农民收拣，放在臭烘烘的大粪桶头上，叉开脚像骑马。看得我们笑都笑不出来的暗暗嫉妒。这天走得过了头，总共约走了四十多里路，白头没怎么休息，天快黑尽了还没走到目的地。又累又饿的我开始边走边哭，白天大熊掉队我哥他们都没管，此时更不会有谁来背我哄我。走不动是自己的事，谁让我死皮赖脸要跟来？明白苦是自找的，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

夏天四川乡下的暗夜纯净温和，村落人家都少有电灯，农家的油灯如豆如萤火虫光，天不黑尽还舍不得点亮。习惯上，川西农民晚上七八点不会回家吃晚饭的，借残余天光，农民们还要打草鞋铡猪草着实再忙一阵。本来朦胧夜行比白天凉快，如果还有点食物下肚撑着人没那么累的话，行走在晚风飘然。半睡的昏黑中我失去了方向感，高一脚低一脚的，勉强跟着脚下深灰色宽带子似的公路移动，路延伸向前几米就模糊不清了。

走着，偶尔能听见农民呼哧呼哧挑着沉重的担子，由远而近的与我们同行几步，又消失在黑暗中。每次我都醒来哭兮兮问黑暗中的人：

“红卫兵接待站还有多远？”

川西农民没有精确的距离概念，他们的回答总是马马虎虎的随便：

“不远不远，里把路（一华里）就到了！”

结果我们为了这“里把路”，打起精神不知又走了多久？直走得东倒西歪，终于走到镇接待站那刻，双腿僵硬得连浅浅的门坎都迈不过了，登记了找到房间爬上床就睡得人事不省。两天后我们就这样走到了大邑县，进“地主庄园”随便看看，又胡乱在街上逛了一圈，买点吃食就该说往回走的话了。

按原路回到双流县黄水乡接待站那晚，这是我们步行的最后一夜，第二天就能回家的念头兴奋又担心，睡不着觉生怕哥哥们早晨起床出发忘了叫醒我。同房间还有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女孩也是成都人。我们的故事相同，同是硬跟大男孩们出来步行串联，被男孩们讨厌却又甩不掉的包袱。临睡前我们说好第二天两人死活要粘在一起走，万一被哥哥们丢掉的话我们好歹是个伴。就这样可怜巴巴的，两个小女孩自定了必被遗弃的结果。

迷糊到天亮，两人急忙跳起来跑到接待站门口，问管登记的人我们的哥哥们是不是已经走了？接待站管理人是当地农民，根本没听清我们问题，顺口说他们早走了。心里早有被人丢弃预算的我们惊慌地狂追出去，沿公路不断追啊走，好在大方向正确，懵懂走回成都走回了家，回到院子里才发现我是孤独先行者！

原来我们大清早慌张离开接待站时，两拨成都男孩们还在接待站的床上呼呼睡大觉呢！记忆基本上空白了当时到底是怎麼走回成都的，只记得我的口袋里还有最后两毛钱，经过一个小乡场时，买了两块油炸窝子油糕五分钱一块，每人吃了一块，剩下一毛钱没敢花。进了成都南门后，那女孩子怯生生问我要了五分钱，要打公用电话到水电局门房跟她父亲。她从未打过电话，不知号码盘往那个方向拨。

事后想来诧异，十一岁的小丫头，鸡嫌狗不要的跟哥哥们来回走了几天，自找没趣的累了饿了哭了也没人理会。来回一百多里路胡乱走下来，最后还把自己弄丢。凄惶中拣了个更不谙世事的难友，居然一路平安带着她回了成都，勇气十足但荒唐得不可思议！

我，我哥哥们和我们同时代的少男少女，荷尔蒙充沛，精力过剩，满脑子到世界上乱闯念头。幸运的是我们平安回了家，渺小的生命没有莫名其妙消失在那荒诞年月里。■

【述 往】

文革杀人现场目击记

刘放¹

文革过去已近半个世纪，许多当事人都已逝去。最近社会上对文革的评价呈现多元复杂，因时间久远，人们对这些历史印象模糊，日渐淡忘。有些年轻人甚至将文革这场劫难想象为美好乌托邦。一些为文革翻案的言论也时常见诸于媒体。文革的真相到底如何？现在好像是越来越说不清了。

然而历史事实应该是很清楚的。人们只要尊重历史，尊重客观事实，只要是个正常人，对这些是非、黑白就应不难作出判断。

作为过来人，我曾亲眼目睹文革的杀戮，其血腥场面终生难忘。

—

¹ 原名刘剑星，中国广东省梅州兴宁人。1982年毕业于广州暨南大学中文系。同年起在广州《花城》杂志任文学编辑。1988年起移民澳大利亚。现居澳洲悉尼市。大学期间开始在国内各报刊杂志发表作品。在澳洲从事业余写作，曾在澳洲多家报纸副刊撰写专栏文章。并曾任职中文期刊、报纸。多年来在澳洲及海外各种报刊、网络媒体上发表大量文章。作品包括小说、评论、杂文随笔、散文。

那是在1968年。这一年农历闰八月，民间有传言“闰七不闰八，闰八动刀杀”。春夏之交，一连数晚天现扫帚星。老人们都说这是大凶之年。

此时文革已进入第三年，全国陷入武斗。中央号召各地革命造反派大联合，但无人听令，局面近乎失控。毛泽东拿出杀手锏，一怒而治天下。中共中央接连发出“七三”、“七二四”布告，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毛泽东也向全国发出了“专政是群众的专政”的最新指示。

“清理阶级队伍”在当时的语境中即是镇压和清洗，“群众专政”则是杀戮的代名词。这样，一场杀戮运动在全国各地展开。这些都是一种“跟风”行动。文革最大特点是群众运动，群众运动就靠跟风。这股杀人风潮像瘟疫那样四处蔓延，无人制止，无人敢于阻挡。这是当时的绝对政治正确，文革的原则是越左越革命。

秋季，这股风也传到我们家乡。先是听到传闻，某某县开始杀人了。接着又传闻某某公社也开始杀人了。于是，我们公社也开会落实执行清理阶级队伍，并要求各生产大队落实公社党委、革委会的决议。各大队党支部、贫下中农领导小组也连夜开会部署行动。

八月里一个月黑风高夜，12点整，全公社突击行动，基干民兵们对地、富、反、坏、右等所有阶级敌人家庭实行抄家。虽然进入文革以来，抄家已是家常便饭，但这一次势头不同，所有民兵都荷枪实弹，气氛紧张。那些“重点对象”都被连夜捆绑关进大队部。

经过数天的审讯，一切就绪，列出了首批要杀的阶级敌人名单。这些会议都是绝密的，规定谁也不许走漏风声（当然还是没有不透风的墙）。

这一天，公社召开万人大会，通知规定谁都不得缺席。会场就在公社门前的篮球场，球场边上有个土台，有电影队来了、剧团来了就在此放电影、演戏。公社开万人大会，这里就是会场，土台就成了主席台。说是万人大会，其实来的人没有那么多，全社一万多人口，除去老人小孩，参加者有那么几千人。就是这球场也是容不下上万人的。但当时开会都说是万人大会，这样就显得声势浩大。

土台正前方拉着一条横幅，斗大的字写着：某某公社批判斗争大会。会场上黑压压站着、或席地坐着参加大会的社员们。主席台上和会场周围都站着荷枪实弹的民兵，气氛相当紧张肃穆。以往开这样万人大会，不管台上谁在讲话，下面总是吵吵嚷嚷；而这一次，数千人居然鸦雀无声。连孩子都不敢哭叫。人们都知道今天要发生什么事。风声早就传出了。

全社的“五类分子”今天也集中在这里，他们齐齐跪在最前面的土台脚下，每个人胸前都挂着一块硬纸皮做的牌子，写着他们自己的名字和身份标识，如“狗地主某某某”，名字上画着红色叉叉。他们的脑袋则令人发笑，一个个都被剃成阴阳头，或十字头。几个武装民兵在他们后面走来走去监督着，民兵们手持一根皮带，不时抽打他们一下，杀他们的威风。

高音喇叭嗡嗡尖响几下，公社书记宣布批斗大会开始。奏东方红，敬祝领袖万寿无疆、副统帅永远健康！书记又带头，大家一齐念毛主席语录，内容都是选好的，如：“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等等。然后，书记做了一个简短的动员讲话，说今天批斗大会就是要实行群众专政，消灭敢于顽抗的阶级敌人。

然后，公社武装部长高声宣布：把阶级敌人带上来！

几个武装民兵押解着十几个五花大绑的“阶级敌人”，从舞台一侧缓缓走出，逐次跪在土台前面。他们除了胸前挂着牌子，每人头上还戴一顶高高的纸帽，有男的也有女的。此时有人领头高呼口号：“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专政是群众的专政！”等等。台上台下，口号声响彻云霄。

仔细看了下这些跪在台上的人，他们的脖子被麻绳勒的紧紧的，一个个塌拉着头，脸色死灰，有的浑身战抖，大概都知道末日临头了。这些人中，有些是认得的，那是我们大队的，平日都叫什么婶什么伯；有一个是住在镇上的，为我们族叔。赶集时，村人都喜欢在他家落脚，喝点茶水，寄放点东西杂物。都是乡里乡亲，平时都感觉挺和善的人，今天

突然间就变成了“专政”对象。我至今依然记得其中几个人的名字（如有文革研究者需要，我可以提供这些资料）。

接着，各生产大队的干部代表纷纷上台作批判发言，揭发这些阶级敌人的罪行，宣布他们的罪状。干部们一个个义愤填膺，磨拳擦掌，说这些阶级敌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这些罪行大同小异。如：恶毒攻击领袖、攻击文化大革命（多为平日牢骚怪话，被人告发）；对大跃进、人民公社不满；多种自留地、破坏抓革命促生产；写反动日记、记变天账（这种指控多有牵强附会，比如说日记上写“最近天气严寒”就被指映射社会主义制度，等等）。最严重的是在某个阶级敌人家砖墙内抄到一排步枪子弹（这房子住过数代人，天知道是谁留下的子弹）。实际上，这些人也许在生活中有点小毛病，也许处世不慎有时会得罪人。也有些人与生产队干部间有房屋、土地等小经济利益纠纷。

发言结束，口号声四起，大家同仇敌忾。此时气氛已达到火热的高潮。台上有个公社干部对着麦克风，高声发问：“大家说这些阶级敌人该不该打？”

台上台下一齐呼应：“该打！”

干部又问：“该不该杀？”

台上台下又是一片声：“该杀！”

此时早已准备好的一伙人挥舞木棒、扁担、锄头柄等涌上舞台，对准跪着的阶级敌人乱棍齐下。一时血肉横飞，鬼哭狼嚎，像杀猪场那样，尖叫声、哭声、哀嚎声响成一片。跪着的阶级敌人纷纷倒地，他们身上的纸牌、纸帽被打碎，纸片满台飞舞。台上还有人吹着哨子指挥，有人一声一声喊起号子：“一，二，三，四，五，六……”打人的棒棍声也渐渐齐整起来，合着号子一起一落。期间，台下群众中也不时有人跃上土台，接过棒棍参与打杀。

这一刻恍如时空穿越，人类又回到茹毛饮血的蒙昧荒蛮时代。洪荒时代人类野蛮打杀同类，也许是为了生存。人类在漫长的演进过程中，出现过无数次血腥杀戮。但在和平环

境里如此屠杀同类，应是绝无仅有（希特勒屠杀的是异族）。今天出现的屠戮，是出于莫名其妙而又冠冕堂皇的政治理由。

这样约莫打了十几二十分钟，嚎叫声渐小，都不大听得见了。打人者棒棍也慢慢停了下来。土台上横七竖八趟着那些阶级敌人，他们浑身是血，有的头脸都打得稀烂，花白的脑浆流了出来，涂在泥土上，也溅落在打人者的衣裤上。有一个人耳朵被打脱，仍连着皮挂在脸庞上。地上到处是血，在八月的阳光下，血很快凝固，变成黑色。整个会场飘散着血腥味。闻到血腥味的苍蝇一成群结队飞扑过来吮吸人血。人群中有人在呕吐。

我注意到在打杀过程中，台下许多人都低下头不敢看，尤其妇女们。呼喊口号时，不少人也是随着大家举手，口一张一合，没有发出多少声音。“物伤其类”是人作为动物的一种本能。人们感情复杂，内心惶恐，但都不敢表露。更无人敢则声。

文革结束后，有不少人质问：为什么那么多在场者不敢站出来说话？为什么没有人上前制止？可以告诉你们的是，在文革那种环境中，如果谁站出来，谁就将粉身碎骨！这个道理三言两语是无法说清楚的。

也有人就此问题问过著名作家萧军，为什么文革时他在批判会上受尽凌辱，却仍然忍得住，没有反抗——因为萧军身强体壮，精通武艺，且性格刚烈。萧军是这么回答的（大意）：当时的确想过拼死一搏。以他的武功，杀死几个也不是不可能的。但考虑到，一是这样死了毫无价值；二是现场陪斗的一百多难友会因此被连累全部打死。再说那些红卫兵本身也是受害者，他们也是无辜的。

有一则关于赫鲁晓夫的传闻，也同样能说明问题。赫鲁晓夫在某大学礼堂做批判斯大林暴政的报告，有人传上来一张纸条，质问：你当时在干什么？赫鲁晓夫环视台下，问：这是谁写的？良久无人出声。赫鲁晓夫笑道，我当时就像你那样！

我自己当时就站在台下。而且站得很靠前，近距离目睹了一切。我也属于不得不举手，也不得不张开口的那类人。我不是黑五类子女，但家里也笼罩着恐惧阴云，我父亲已被其单位揪出批斗。作为一个弱小者，我政治上很早熟，不像我的同龄人那样相信一切，对当

时的文革和政治，已经有自己的看法。面对眼前的杀戮，我心如刀绞。但确实没有飞蛾扑火的勇气。而我选择近距离观察，见证了这一场历史惨剧。

再说说那些杀人者。他们中大部分是基干民兵，是奉命行事。有些是学校回乡的红卫兵。他们是为了证明自己的革命立场。也有些人是想乘此争取表现，想捞点好处（自发从台下冲上去的多属此种人）。还有些人平日与死者有隙，公报私仇。有某个“阶级敌人”的亲侄子，也上去打他的亲叔。也看到一个二流子，还有一个弱智傻子也上去参与打杀。参与打杀的人不下几十个，“专政是群众的专政”名副其实。

这些人在日常生活中就是一个普通的人。他们并非天生就是恶棍。他们在家里也许是个好丈夫、好父亲、乖儿子。他们也并非愚昧没有文化。这些人都具初中、高中文化程度。他们杀人是以革命的名义。这种现象，就是德国哲学家汉娜-阿特伦所称的“平庸之恶”。他们服从领导，崇拜领袖，无法作出自己的判断，平庸到了丧失了独立思想的能力，无法意识到自己行为的本质和意义。可以说，整个文革期间的杀戮、迫害，大都为这种“平庸之恶”。

就人性而言，人都有善、恶一面，人的“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在“恶”的环境中，通过“恶”的诱因，人的邪恶一面就会表现出来。文革让人性中最丑恶的一面淋漓尽致表露无遗。

二

回到杀人现场。人都杀死了，当然就宣布散会。人们各散西东。远地来的社员们拿出自带的干粮，边吃边赶路回家。最边远的，有30多里的山路。按规定，开万人大会生产队给记工分，他们也就权当是出了一天勤，打了一天工。

自明、清以来，到民国、土改、三反五反，凡处死的犯人都埋在镇子后面小山岗上。已勒令了几十个比较强壮的五类分子负责抬尸，四人抬一个，每人抓住一只手或脚，像蚂蚁搬家那样往山上爬。但人们发现有些“死人”并未完全死去，有的还能睁开眼睛，有的

还在哼哼唧唧发出呻吟声。看来木棒等冷兵器的确效果不好。公社领导商量后决定，给他们补一枪。这吸引了许多孩子们跟着上山看热闹。

十几个已死或未死的阶级敌人被放置平躺在山岗上，一路排开。山岗上草木茂盛，还开着几枝鲜艳的秋杜鹃。开枪的是一个中年民兵，他是退伍军人，参加过朝鲜战争，是一个汽车兵。虽未直接打仗，到底经历过战争，胆子大。只见他嘴含一支香烟，边吸边给步枪上子弹。他若无其事地举枪，好像没怎么瞄准，在一米左右距离射击。“叭！”一声枪响，子弹射入其中一个人的胸膛，弹洞里徐徐冒出一缕青烟，洞口空空的，却没有冒出鲜血来。原来用的是开花子弹，背部的出弹孔有碗口大，血都流在下面了。

接连补了好几枪，打死了好几个人。但他的枪法也并不太准。有几个补了枪的人仍不断气。有一个女人，是四十多岁的地主婆，连补了两枪还张口说胡话，我听她在小声念着：“初一，初二，初三……”应该是数的农历，但不知她是什么意思。

还有一个人，被开花弹打去半边脸，连同半个上颚和半个下巴都打飞了，剩下的半个嘴巴却仍然一张一开的，喉咙里咕噜咕噜直往外冒血泡。只得又补了一枪。我怀疑这个民兵自己也害怕了，手打颤，所以打不准要害。有个当赤脚医生的民兵接过他的枪，打死了最后一个。

然后，也是那些抬尸的五类分子们，就近在旁边挖坑，把这些人草草掩埋了。没有人来收尸，他们的家属连看也不准来看。

事后我回到家，躺倒在床。数天吃不下饭。这是我头一次看杀人，而且是近距离仔细地看。母亲采了菖蒲、葛藤、艾蒿煮了水给我洗澡，说是驱邪。

这样杀人的事毕竟比较轰动，成为人们谈论的中心话题，街头巷尾，村村落落到处都在谈论。人们传说着不同版本的所见所闻，谨小慎微地隐喻表达看法。晚上孩子哭叫，大人也会以此吓唬孩子，至孩子不敢夜啼。

据传闻，那天参与杀人者回到家里大都被父母、老婆责骂，当然是关起门暗中骂。那个当赤脚医生的民兵，更被他母亲打了几巴掌，他母亲又哭又闹，说她不知是哪辈子作下

的孽，迫儿子跪着当空为那些死人烧了纸钱。私下里没有多少人赞同这种屠戮。即使在文革中，应该说大多数人都良心未泯。普通百姓仍固守着传统是非善恶道德观念。

但不可否认，文革是道德沦丧、重新走向野蛮的开始。

凑巧的是，约两个多月后，那个中年退伍军人一天突然暴毙。他先是肚子剧痛，急忙送到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人都传说是遭报应，死魂索命来了。此事到处传得沸沸扬扬。类似的话题多少年后还不时被乡人提及，以告诫年轻人。30年后，那个赤脚医生的儿子也因车祸横死，他家自此绝了后。人们又将此事与他当年杀人相联系，说是天报应，只是来迟与来早的问题。当然也有些人不以为然，认为这是迷信，说人家至今躺在天安门广场都没啥事，不是还好好的？

据说，当年公社党委计划还要杀第二批第三批。但十月里中央突然发了紧急文件，严禁杀人。这才刹住了各地杀人歪风。否则不知还有多少人头落地。

许多研究文革的专家学者都注意到，在文革中找不到一纸毛泽东或中央同意或命令杀人的文件、指示。也就是说，这全是基层干部的错误领会和理解，杀人风潮是群众自发行为。一句“群众运动”就推得干干净净。而1968年的杀人风潮正是在《七三》、《七二四》布告和毛泽东最新指示发表之后发生的。正是这些文件、指示的含糊措辞，及意向性误导，酿成了这场灾难。杀了那么多人却不留痕迹，这是杀人的最高境界。也是厚黑的极致。

文革杀人始于1966年。如北京大兴县，自8月27日至9月1日，该县的十三个公社，四十八个大队，先后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共三百二十五人。最大的八十岁，最小的仅三十八天，有二十二户被杀绝。

自此之后，文革不同程度的杀戮从未停止过。至1968年形成高潮。仅湖南道县，1968年被杀死的“五类分子”及其家属（包括老人、小孩、孕妇）就有4519人。还有326人被迫自杀。

以当时中央的权威，以毛泽东的威望，及早发一个“最新指示”，或发一个中央文件严禁杀人，是完全可以制止这种杀人风潮的。因此很可能有人在这方面拿捏火候，把握制止杀人的时机。

也不可否认，在这种风潮中，民众的整体素质，个人的道德素养，有没有良知、善念，都大有关系。事实上文革杀人的程度在全国很不平衡，有的地区是重灾区，有的地方就杀得少。举例说，我们邻近有个公社，在这场风潮中一个人都没有杀。原因是公社书记的母亲很善良，长年吃斋念佛。她再三告诫儿子：不许杀人。书记是个孝子，果然遵母命，没有杀害一个人。产生这样的悲剧，许多人也都负有责任。全民都值得反思。

文革后，这个公社书得到表彰。但也没有被提拔重用。其他杀死了人的公社，书记都不同程度做了检讨，但很少有人被起诉或追究责任。因为这种屠戮都是集体行动，从来“法不治众”。就是公社、大队的杀人名单，也是集体议定。所以文革这类罪恶很难得到清算。

整个文革中究竟杀死了多少人？至今仍是个谜。1980年邓小平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说：“永远也统计不了，因为死的原因各种各样，中国又是那样广大，总之，人死了很多”。国内外研究文革的专家学者统计出来的数字各有不同。根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合编的《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事实》载，1984年5月，中央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核实，重新统计的“文革”有关数字是：420万余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万5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23万7千余人，703万余人伤残；7万多个家庭整个被毁。

这应该是个相当保守的数字。■

【述 往】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院内院外

安 红¹

爷爷拉着我的手
往收租院里走
收租院里有个女孩子
和我一样
也拉着她爷爷的手

.....

坐落在四川大邑县的刘文彩收租院，我儿时经常去参观。

褴褛的衣衫，饥饿的眼神，凹陷的眼睛，精瘦的躯体，异常悲惨的场景，格外压抑的氛围……每次参观回来，我都会做噩梦，梦里大喊大叫，挥胳膊踢腿外加喊口号，然后被父母摇醒，安慰，哄好再入梦。因为晕车呕吐的缘故，我不喜欢去，宁愿上山拔草，下垄摘豆，地头拾粪。年幼的心里一直纳闷儿：托儿所的老师阿姨为什么总是会带我们前往那个地方？慢慢地长大，会鹦鹉学舌，于是知晓原因：与反动派抢夺无产阶级的教育阵地，为了不让人民再吃二茬苦，受二茬罪。

军区大院里，晨钟是急促嘹亮的起床号，暮鼓是迟缓悠扬的熄灯号。平时则充满了各式各样的革命歌曲。耳濡目染，日夜熏陶，四二拍四四拍的节奏融进了血肉里。一灶二灶三灶……一直数到八灶，均匀地分布在大院里。灶，就是食堂的简称。八个食堂里，菜肉

¹ 生于1968，会计，法律专业毕业。曾在电力集团和期货证券从业。1999年移民澳大利亚，BUPA保险公司销售顾问。“澳华文学网”“澳洲网”撰稿人，现任悉尼新州华文作家协会副会长，《南洲沙龙》会刊主编。

包子馒头大饼糖三角豆沙包切糕麻花油条宽窄各式面条，猪肉炖粉条，腊肉煨白菜，栗子辣鸡丁，酱鸭子炸黄鱼，还有等等等等，管吃管够，只是一日三餐要定时定点，过时不候。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母亲最恨我挑食，外加吃饭慢，耽误她夜间去上战备班，所以于晚餐时分向毛主席请示汇报之前，先给我单开一个耳提面命的小灶——

“你现在多么地幸福啊，有吃有喝一日三餐，红军过草地时煮皮带吃野草，一天只吃一顿饭，快吃！”

“肥肉怎么你了，你和它有什么冤仇，都吐出来，红军在井冈山只能喝红薯稀饭和南瓜汤，根本没有肉吃，统统咽下去，快点！”

“不爱吃菜，不吃菜缺维他命会便秘，红军过雪山时别说炒菜了，连菜根都吃不上，快嚼！”

我嘟着嘴，噙着泪，抬头低头，一口一口地遵命嚼着饭菜，却独独把肥肉含在舌头底下，或者藏在牙腮帮旁，琢磨着什么时候才能找个机会吐出去。

“想当年最饿的时候最年轻，我跟你爸爸还有叔叔阿姨们饿得都没饭吃，瓜菜代，拌红薯叶子，喝小球藻，全身浮肿，一按一个坑……”母亲突然停住了，错愕着。我眨着眼睛，弄不机密她说的“瓜菜代，小球藻”是什么东西，边嚼边等下一句，好不容易等到了这个空子，转身就把肥肉吐在了早已准备好的草纸里，塞进裤兜。心里有些怯怯的，着实怕她发现以后那凌厉的高声大喝，还有瞬间即出的五指大巴掌……父亲较母亲温柔慈祥，在一旁看着却不说话，时不时地给我拨些绿色蔬菜，还有滋味浓郁的菜汤。

但是把父亲气恼了的时候并非没有。他每日早起，额外给家里每人煎一份荷包鸡蛋，我吃腻了，上学之前偷偷地把煎荷包蛋扔进了厕所。

三五天过后，厕所就堵住了。

父亲从工程处借来了疏通管道的工具，我没见过那些工具，充满了好奇心，揉着辫梢在一旁观看。

疏通堵塞的结果吓了我一大跳，吓飞了辫梢。

疏通堵塞的结果也吓了父亲一大跳，一跳三尺高。

——铁钎的前面竟然串着七个完完整整的油煎荷包蛋!!!

手抽五指山，脚踢清炒笋，挥臂杀威棒……好一顿急风骤雨般的暴打，我根本没时间寻思，也没时间解释，我只扔了四个啊！晚上弟弟爬到我的被窝里，紧紧地搂住我，贴在耳边偷偷地说，“姐姐，有三个鸡蛋是我扔的！你还疼吗？”

我咬着被角，大哭，不敢出声，怕因拐带弟弟浪费粮食没做好榜样再挨上一顿铁拳。

关上军区大门，我几乎不知道大院外面的世界。

周日赶街逛成都，午餐时分来到一间饭馆，母亲为她自己点了一碗红油抄手，为我点了一碗黑芝麻汤圆。母亲前后端好两只大碗坐下，起身拿筷子汤匙的瞬间，一口浓痰就被吐在了红油抄手上，母亲发愣的功夫，那碗红油抄手就直接被抢走了，端碗的人并不走开，呼啦啦一下子喝下去了半碗，连油带辣地呛得直咳嗽。

母亲回转过神儿来的时候，用手盖住了黑芝麻汤圆的碗。

“哪一个会抢娃儿子的饭？”那是个盗亦有道的贼，边说边大口吞着红油抄手。

“吃得好安逸，谢谢解放军大姐！”那还是一个懂礼貌的贼，吃罢合手称谢。

然后扬长而去！

四个大汤圆，满满一大碗，我那天只吃了一个，推说吃不了，让了三个给母亲。

母亲挣着三十八元的工资，整整十八年。六点起床，白天工作严肃紧张，晚饭后与父亲一起，撇下我后来加上弟弟，分别去上紧张严肃的战备班。战备班要上到子夜十二点，下了班之后才回家，洗洗涮涮，入睡至少要凌晨一点以后，没有一分钱的加班费和额外工资，每周七天只有周日一天才可以睡懒觉，这样的军营生活，伤肝摧胆，脾气能好才怪！可是那天她脾气格外的好，只是一个劲地说，“不着急，慢慢吃，我想你舅舅了！”

母亲的举止出乎我的意料。

“那年夏天你舅舅闹革命，在重庆，革命革累了，走了三天三夜，来成都找我和你爸爸，三天三夜啊，没有吃东西！我问他你想吃什么，他说，我想吃肉。你爸爸赶快给他做了一锅炖肉，我给他熬了一锅粥。到吃饭的时候，我就是不让他吃肉，光叫他喝粥，整整喝了一天的粥，怕他把胃吃坏了，不能继续革命。第二天，才敢叫他吃上一点点肉……”

“闺女，你给我记住，要是好长时间没有吃饭，千万不能一下子就吃很多肉，那样会蛋白质过敏中毒，会死人的！”

母亲的言行出乎我的意料。

多年以后我还记得当时的我，听到舅舅是在“闹革命”时的那种心潮翻涌的神圣感觉，“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我默默地在背语录，“革命就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母亲在重庆的后面，漏说了武斗两个字。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重庆大武斗，“闹革命”的舅舅只差那么一点点就被打死。

周日赶街去崇州，大院附近的千年老城。在古老的城墙下集市的边缘处，我看到了几个身高与我相似，年龄与我相仿的女孩子，脏乱的头发，迷惑的眼神，皮包骨头的身板，破得不能再破的褴褛衣衫，打着赤脚，概无例外在脖颈处插着草标……

我迫不及待地问母亲——

她们为什么不像我一样衣着干净整洁？

她们也是挑食不吃肥肉才这么瘦的吗？

她们为什么要插草标？

母亲牵着我的手，任凭我怎么问，咬紧牙关不开口，继续领着我往前走。

被一根伸出来好长的竹竿绊了一下，我跌倒了。顺着裂着口的竹竿头，我往上朝前看，看到了脑海里再熟悉不过的一个画面，和收租院里几乎一模一样，栩栩如生的会说话的雕像——浑身破布条般一缕一缕的衣衫，戴破帽半遮颜的老爷爷，黑青的瘦脸，无神无光泽

的一只枯眼，捧着一个掉瓷裂缝缺口的青花大大碗公：“可怜可怜我吧！给口饭吃吧！好人，好人，给我口饭吃吧！”

我到底是身在大邑县的泥塑收租院呢？还是在崇州街头？

这到底是发生在恶霸地主刘文彩的庄园里呢？还是革命群众扮演的街头活报剧？

他不是真的瞎子吧？他是装的吧？

母亲牵着我的手，任凭我怎么问，咬紧牙关不开口，继续领着我往前走。

逼真的收租院的泥塑和逼真的现实就这样交织融合着，在我的眼前晃动着，模糊，清晰，清晰，复又模糊。无言无语的母亲不需要告诉我答案，我已经知道了——

那些插草标的女孩子是被卖的！

那个拄着裂竹竿捧着破碗的老爷爷是乞讨要饭的！

回到家我就病了，夜里做噩梦，挥胳膊踢腿大喊大叫，那一夜无论父母怎么抱我哄我安慰我，我都没有再入眠。■

【本刊声明】

本刊声明

《记忆》创设于2008年9月，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本刊的宗旨，并取得会员资格者，皆可获得本刊。

《记忆》主张众生平等，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记忆》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的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等内容，均受国家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未经著作权人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xx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信箱：fxc1966@163.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

本期编辑：老方

封面设计：邹行